



书生私见

SANWENXINGZUO

谢泳

自选

我 以 为 我 们
今 日 要 向 前
走 最 需 要 做
的 一 件 事 就
是 退 回 到 五
十 年 前 从 那
里 开 始 重 新
认 识 我 们 今
后 要 走 的 路

书生私见

SANWENXINGZUO

SANWEN XINGZUO

谢泳
自选集

集

SANWENXINGZUO

“散文星座”丛书第一辑

《书生私见——谢泳自选集》

《手艺的黄昏——车前子自选集》

《一脸阳光——鲍尔吉·原野自选集》

《俯仰集——止庵自选集》

《时尚杂志——秦巴子自选集》



ISBN 7-5321-1756-1



9 787532 117567 >

策划: 宫 玺

SANWEN
XINGZUO

书生私见

谢
泳
自
选
集

散文星座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王志伟

散文星座丛书

书 生 私 见

——谢冰自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48,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21-1756-1/I·1420 定价：13.50元

“散文星座”丛书序

宫 玺

得天时地利之滋育,九十年代的散文无边葱茏。

或说有些芜杂。是的。也许这是生机勃勃、花卉竞长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丰茂总比单调好。

这气象,让人想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催生的二三十年代散文的诱人光景。是不是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散文的回归,九十年代是散文的复兴?

稍加比较,就可看出:九十年代的散文,内容更开阔,思想更活跃,题材更多样,形式品种更丰富。而尤可称道的是,作家的精神更为自由,心态更为舒展。破除了套套框框,无拘无束,散文更具特色更见个性。

复兴不是复现。复兴是在以往传统基础上发扬光大,开拓创新。

九十年代的散文,天地高远,写散文者多得难以计数。老作家健笔依旧者大有人在,中年作家势头正旺,而青年作家,则是颖秀新锐。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学者都欣然执笔为文,有些艺术家也抑不住相继参

与。于是散文家行列中出现了年老的“新秀”。而才思出众的女作家更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或说，散文在九十年代复兴是复兴了，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作为个人，似乎还没有可与二三十年代相媲美的诸多散文大家。仿佛如此。但请别急，且期以时日，放眼新的世纪，谁能说年轻一代中不会出现光耀文学史的人物！

《散文星座》丛书无意标榜什么旗号，只想向读者推荐一批有切实独特感受、有真知灼见和文学才华的年轻散文作家，他们有的已被文坛注目，有的正引起注目。他们天南地北，风格迥异。散文的疆域原本宽阔，而凡佳作总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呢？

1998年3月8日

自序

收在这本书中的文字是我近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时写下的,其中有些已收入《旧人旧事》和《学人今昔》两本杂感集中,这两本杂感集在出版时多少都遇到了一些周折,在文字上也稍有调整,这次收入本书时,尽量采用了最初的底稿。本书虽是一本自选集,但多数文字还是第一次结集,这是我特别要说明的。

我近年写作这些随笔时,心里有这样一个想法:由于我在研究中多少接触过一些原始资料,所以我在发议论时都是有些根据的,我对逝去的文人生活多少有些怀恋,尽管那样的生活不曾属于我,我还是希望能从资料中发现一点对今日生活有启发的东西。

随笔这种文体近年很盛,这是一件好事。现在的随笔有各式各样的,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写得明白晓畅,有一点议论,有一点激情,还要有一点人和事。我想尽可能写得简单一点,因为了解过去,认识未来都需要先回到常识,回到基本的历史真实中来,因此也就应当多有平常心,多说家常话,这种写法对于随笔

这种文体来说，我不知是否合适，但我是这样写下来了。我的这些文字虽多是从旧史料中引出的感想，但我并不是想把一切资料都写成文坛轶事或学林掌故那样的东西的，我下笔的时候，总有一个当代生活的参照，我是在新和旧、今与昔这样的对比中，重新发现旧日生活的色彩的，我以为我们今日要向前走，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退回到五十年前，从那里开始，重新认识我们今后要走的路。我的努力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历史，我们的前辈曾经是怎样地一点一点为国家的进步而努力的。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于山西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

目 录

自序	[1]
陈垣的转变	[1]
杨树达的屈辱	[6]
晚年贺麟	[12]
顾颉刚的恐惧	[18]
汤用彤的顾虑	[23]
钱端升的一个学生	[27]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29]
晚年冯友兰	[36]
胡适与冯友兰	[40]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45]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50]
舒芜：回到起点	[56]
升达的学术道路	[63]
吴晗的悲剧	[70]
读吴晗给傅斯年的一封信	[74]

绝望的王芸生	[82]
晚年曹禺	[92]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97]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102]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106]
沈从文：幸亏没写小说	[113]
张东荪这个人	[115]
再说张东荪	[123]
吴世昌的选择	[131]
安福三才子	[141]
关于蒋梦麟的一件旧事	[145]
梁漱溟与储安平	[148]
陈寅恪与周扬	[152]
1959：谁在思考/读《顾准日记》	[155]
记住这位文化老人	[161]
范文澜的无奈	[164]
去少留多的困惑	[167]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171]
无奈的群体	[173]
杂文的忧虑	[178]
互相理解	[180]

谁来当大学校长	[183]
散文还是旧的好	[185]
论战的规则	[188]
做人的底线	[191]
读毛主席的书	[194]
还是他们	[197]
五四人物的职业	[200]
经典的魅力	[202]
怎样了解过去	[206]
珍惜思想遗产	[208]
毕业论文	[211]
学生的气质	[214]
过去的大学生辩论	[217]
自传的可信与不可信	[219]
西南联大的启示	[222]
不是责备文人的时候	[227]
文人难过皇帝关	[232]
旧书店	[235]
普及吴祖光	[237]
遥想教授当年	[239]
过去的教授	[242]
学会道歉	[249]

过去的“启事”	[251]
传记不如年谱 年谱不如日记	[255]
以小见大	[258]
右派的比例是怎么确定的	[262]
说稿酬	[268]
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	[272]

陈垣的转变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 1949 年前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 17 通，陈寅恪的信 19 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8 年底，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三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三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的转变，可以理解，也令人遗憾。

1948 年 12 月 13 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 页）三个月后，1949 年 4 月 29 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

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我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

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 118 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 69 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近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在陈垣的转变中，年龄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一个事业有成的老人，他的妥协也许仅仅是为了求得安逸，而不再是去重新选择一种信仰。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生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 1952 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

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1949年以后，他没写一部专著，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年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没转变，不仅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三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二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然小陈垣十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进步了，但再没留下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收有 1935 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铭是行政院长（见该书 624、625 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1949年后，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1948年他是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年9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同事，

故有违教一语也。”(345页)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两个人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年代初,杨树达就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167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

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深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甚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余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400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

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 501 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囑编译局出版云。”（366 页）“以《甲文说》再寄郭沫若。郭来书见商 16 篇，余汰去 11 篇，又自汰一篇，16 篇中仍存 5 篇。”（367 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 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态度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 页）可以说，从 50 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 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校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已又借口事忙不审，可谓虚负院长之名矣。”（396 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

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 503 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 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 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 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345 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

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50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十名教授，最高为6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页)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

晚年贺麟

1982年,已80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抗战期间就都在学术上进入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

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三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年的选择已成为理解他们时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页）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曾三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

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74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的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会通集》31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黑格尔哲学的专家，他怎么能不假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的

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钦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祷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 40 页）这是 1945 年写给胡适的信，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 120 元。1984 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中，收有四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他坦然承认对罗素“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

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旧著为依据。

1941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6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生》一书中。(商务1988年版)在这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

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页，商务版）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1949年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顾颉刚的恐惧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1页,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年,顾颉刚就说过:“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页)顾

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 428 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 531 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 533 页）。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简单地认为顾颉刚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钎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 258 页，1986 年 5 月中华书局版）50 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三个人最深，或者说，这三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三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晗

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没有人会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唯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年4月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潮《顾颉刚年谱》346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年7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 347页)顾颉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不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

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 347 页）

顾颉刚在 50 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1934 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阅《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然而 1952 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

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 346 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 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 352 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恐惧，才能理解学生的恐惧感，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提到顾颉刚，都是旧时往事，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 50 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 370 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但他在 50 年代的恐惧感，却为我们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汤用彤的顾虑

我从旧书摊上捡得一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上册已不知散落何处。此书是1944年在重庆翻印的,所据初版本为1938年6月商务版。这本书是汤先生的传世名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年再印。1983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先生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1955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汤先生的心态。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对政治有热心,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心,像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汤均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恐惧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

术，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时宜的话。汤用彤的经历还算顺利，但他的心境已不如过去从容，不如过去清静。汤先生的名著是 1938 年在长沙印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生在“跋”中除述与学术有关之事外，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乂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生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见该书 155 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梅贻琦长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 190 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 页，百花洲文艺版）40 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

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3页,中华书局版)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如果不恐惧,哪会说这样的话呢?“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1955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不害怕不可能,所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读这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是生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汤用彤评传》

的作者麻天祥说：“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 119 页）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如果我们一方面说新的方法、新的环境如何如何好，那我们要问，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做不出好学问来呢？

钱端升的一个学生

钱端升是中国知名的法学家，当年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培养过许多学生，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了中国法学界的名教授，比如龚祥瑞、楼邦彦、王铁崖等。但也有一些学生不很知名。最近我为了完成一份关于“反右”和“文革”时期学者自杀情况的论文，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知道了钱端升还有一位学生叫田保生，他的经历正好能证明我那篇论文的一个论点。关于田保生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很多，主要情况是从一位老外交官的回忆录中了解的，这本书的名字是《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田保生当年曾和凌其翰在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清华，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应第一届高等文官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40年代末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面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

途是光明的。”对一个处于彷徨中的知识分子，凌其翰的这番话肯定影响了田保生。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中国，不仅他回来了，还劝他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学生一般都很听老师的话，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奔归新中国。回来后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伦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的一份辛劳。”可惜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后来才获昭雪。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中夫妻自杀的情况，我已掌握了很多材料，夜深人静的时候，翻阅这些资料，想到很多很多，有时我不由得想从一种平常的师生关系，去推断钱端升和他的学生的关系，我想，当钱先生知道了田保生夫妇的情况后，心情一定是很沉痛的。我查阅了一些有关钱先生的传记资料，包括许多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回忆文章，但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猜测钱先生对他学生的命运，大概不仅仅是沉痛，而是一种无言的沉默，这沉默是他对自己学生，对自己命运的叹息，这次第，怎一个痛字了得。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政治压力，同样面临生存危机，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政治压力下屈服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起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1974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4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是希望在政府之外,保持对政治的兴趣。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在1949年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那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

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1949年前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页,上海远东版)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

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48页,四川人民版)他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他,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2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 said 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有‘政治’。”(刘培育编《金

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6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这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自由社会中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但他这样的人，特别不适应多限制的社会。1949年他是55岁，在之前那样的世道里，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人格，之后反而要违心处世了。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作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1922年，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

鏊》上写过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年12月4—5日),这篇文章几本关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

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愿他年轻时的愿望不再成为永远的绝响。

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七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着,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人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先生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

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

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说,比较灵活。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时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月1日。”可当查良钊见到冯友兰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

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1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死后在他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羨林挽冯先生说是人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胡适与冯友兰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差不多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四岁却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年，胡适到北大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老师。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有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胡适和冯友兰是来往极少的。

应该说，20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25年9月3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很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仄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页）冯友兰的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先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一直没能说服胡适。1930年3月20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838页）1931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9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4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确实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问题上与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正常的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适读到了在贵

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字”，（《日记》第15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16册）可以说，从50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转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很不符合胡适惯有的宽厚风范。195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The Deik Bodde）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17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说的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著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但陈寅恪先后给冯著《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疏忽了，总之有点情绪化。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或许有偏激处，

但这种偏激却并不是完全的意气用事，实际上包含了胡适当年对一些知识分子为人行事和在思想上迷失的评价，加之流亡美国，一时的情绪可能还没有平静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50年代末，他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又说起冯友兰和他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册3106页）这回倒是还说了半句中肯的话。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差不多是随冯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年他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10册2556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冯友兰没有出国的记载，冯友兰是1948年2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

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表现,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而冯友兰在 80 年代前期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 216、217 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 228 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或情绪化的判断少发生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显然就是理性多于情绪,当然胡适和冯友兰之间的关系,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1949年前，中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曾经很活跃，比如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杨人鞭、王造时、吴恩裕等人，这些学者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我在查阅《观察》周刊、《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刊物时，常见这些大学教授의言论。

后来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即使不消失，恐怕也没有好讲的。政治学的核心无非是一个民主和宪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说了，这个学科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从另一个侧面说，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消失，不仅耽搁整整一代政治学的学者，使他们本人的学术生涯提前终止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消失，使中国人重新变得愚昧起来。我们常说某某东西对一个民族造成了伤害，我感觉政治学者的改业所带来的损失，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我曾和我的朋友丁东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在收集资料和分析“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贫乏，必

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贫乏。那一代青年无论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宪政等等的理解和评价，让人感到他们又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实，他们的前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断了。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也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

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几位学者在 80 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吴恩裕 1949 年后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他先后写了《曹雪芹的生平》、《关于曹雪芹》、《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对红学作出了贡献。但是吴恩裕的本业却不是红学，而是哲学和政治学。他是 1933 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1936 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在做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时候，在《客观》、《观察》、《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许多关于政治学的专论，他也是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当时正是壮年，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吴恩裕特别强调民主的实现和国民教育程度的关系。说到吴恩裕，我特别想说他和哈罗德·拉斯基的关系。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不应当忘记这位费边主义的理论家。考察 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

不应当忽视拉斯基的影响。3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好几位是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吴恩裕等。40年代储安平办《观察》周刊时，在外国人的文章中，以选择拉斯基的最多，而且每次署名都以教授相称，可见对他的尊敬。我不熟悉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但就我所见而言，我觉得研究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拉斯基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吴恩裕在英国的时候，拉斯基是他论文的导师，而且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曾多次帮助过他。1945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第10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详细介绍了他在英国做研究的情况。

从吴恩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出他自己的学术兴趣。他的专业是哲学，但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读历史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将不能获得公费。为此他曾苦恼过。“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入胜。”正是在这种苦闷中，他找到了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此后即以此为自己的专业。吴恩裕年轻的时候，对历史持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想见，50年代以后，他

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的。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再允许研究,无奈之下只得另寻别路。1949年前,吴恩裕已经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年)、《政治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45年)、《唯物史观精义》(1947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但他的学术道路后来偏离了他的学术兴趣。我不知道吴恩裕早年是否就对《红楼梦》有兴趣,但从《客观》和《观察》上的文章看,他是对民主宪政和社会进步抱有热情的。他在《客观》周刊写过《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4期)、《关于奥斯丁主权的讨论》(12期)、《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14期)等,在《观察》周刊写过《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论人性与私产》、《国家与道德》、《自由乎平等乎》、《法律道德与大众利益》、《一个历史的教训》、《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社会契约论》、《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密尔自传书后》等等,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比起来,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1949年也刚好40岁。但看他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大多在40岁前,他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也成就很大,但对吴恩裕来说,我私心以为他一生的学术专业大概还在政治学,可惜历史没有再给他机会。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

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几乎两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学者(以1900年和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代表),在他们50岁和40岁的时候,失去专心治学的时光,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受过中西两面学术训练的学者。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王瑤曲折的学术道路

王瑤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瑤来说肯定是无奈的。1952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瑤文集》第7卷第49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949年，王瑤是36岁。王瑤比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出清华的学者虽然小4岁，但他在1949年前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当时的王瑤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任讲师。对那些1949年前即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的痛苦，我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王瑤痛苦的典型意义

即在于一个人将要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道路，这个新的时代没有延续传统的胸怀，像王瑶这样的人面临的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生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十二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当时王瑶 32 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1946 年 1 月 29 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初试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冯友兰、吴晗四位。同年 4 月 4 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 112、11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王瑶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

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瑶先生纪念集》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的限制。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页)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环境里,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3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位。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这种对

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气质。王瑶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40年代又入了民盟。用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人。1948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他的理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文集》497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胜于现在。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被迫屈服了。他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

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集》507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表述为,在时代政治的高压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在50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王瑶没有逃出高压的罗网,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王瑶当时的处境,从他1951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说:“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文集》602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

代，晚年王瑶特别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著述更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三十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页），痛哉斯言。

舒芜：回到起点

读了舒芜先生的长文（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我是别有一番感慨的。这篇长文是舒芜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回归“五四”》写的后记，也是作者的自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命运的回忆，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近年常谈起冯友兰先生的经历，认为他经历了一个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像冯友兰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如汤用彤、陈垣、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等，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但在由旧到新的历史，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大体都有共同的一面，这共同的一面大体上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另一个代表陈寅恪所不选择的东西。这一代学者不管后来命运如何，他们在过去已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代人固然是一个耀眼的群落，但就个人的命运而言，他们呈现的是另一种悲剧。我在阅读舒芜先生的回忆时，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脑中浮现，冯友兰他们

是一代,中间储安平、费孝通、王瑶他们又是一代,在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又可按那个时代流行的说法,每一代人中,又有左面的和右面的。虽然当年的人生道路有别,但在命运的悲剧性方面,又可说是殊途同归。在他们这两代人之后,更有一类人的命运充满复杂性,这就是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

舒芜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显示了另一种更深的悲剧。这一代本世纪2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在获取知识的最佳年龄,差不多没有赶上什么好时候。舒芜的经历在同时代人中又有特殊性。舒芜出身世家,从他以后做出的学术成就看,他本来是一个在学术上早熟或者说早年求知渴望特别强烈的人。但舒芜这样有才华的人,却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没有能够进入当时的大学读书,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学者。舒芜的未能进入大学,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可以先设想一下,如果具有这种气质的舒芜,在那个时代能进入当时中国著名的学府,先去接触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那些教授,那么他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理解就会和后来不一样。按舒芜的年龄(1922年出生),他是能赶上这个时代最后一批自由主义学生的行列的。而舒芜在自己求知欲最强烈的时候,却在当时的安庆中学遇到了表

兄姚圻,舒芜说:“我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风行,可以说是一代青年学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姚圻带来的书里面,却无此书,而有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厚厚一大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第一本读的就是它。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我,觉得这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两遍,自以为有所得。进而读了姚圻带来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书,更进而自己跑书店,搜读各种马克思主义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理论纲领政策的书刊。”当时舒芜还读了徐懋庸译的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革命领袖人物传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舒芜40年代初到当时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当助教,这所学校虽然有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但学校本身是类似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性质的,而且在战时对学生和教授的思想管制很严。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自由主义真谛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

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也许有人会说，假使舒芜进入了当时的著名学府，接触了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自然没有假设，更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著名学府中，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但舒芜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他是从自身特殊的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本来不是一个穷得非要造反的书生，而是在知识的浸润下，逐渐产生了对现存秩序不合理的反抗情绪的。舒芜总结自己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几个基点，即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五信马克思主义，六尤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七反法西斯，八尤反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法西斯。从这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反抗”，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至于靠什么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怎样，依赖反抗的思想武器本身是否也值得反抗？他们还未深思。这种以反抗为基本思想特征的倾向，遮蔽了许多东西，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初期实际就埋下了种子。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可以设想,如果 40 年代初期,舒芜遇到的不是胡风,而是像胡适、储安平或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舒芜也许就会是另一个舒芜了。因为在舒芜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仅比他大两岁的殷海光。尽管最终胡风和储安平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舒芜一生中,似乎是命运在安排,总让他和另一种思想倾向强烈的人接触。1949 年前夕,舒芜总结说:“我虽然还继续努力,可是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我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虽然仍在撑持,但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胡风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当时的舒芜如果能够一直困惑下去,并最终能够由困惑而怀疑,那舒芜也不会再糊涂下去。他在新时代表面的繁荣面前,或者说在随后而来的压力面前,就连困惑和怀疑也不敢有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舒芜的经历使我想到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的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他与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只有表面的亲和性,而实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参

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最先接触什么思想资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总是有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知识背景多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所以在获取知识的问题上，恐怕真也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今天比较开明的老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那为什么开明的思想源头，要么是大学的教育，要么是留学的经历或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而这些经历舒芜没有。

舒芜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后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他说：“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达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一个学者晚年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多了点什么上，而是少了点什么，这很让我们惊奇。就思想而言，舒芜先生后期所努力的只是从最初的思想中抛弃什么，而曾经抛弃了

的“个性解放”，他还大致能够寻回来，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起点上，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尹达的学术道路

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1949年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历史研究》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尹达1928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年，26岁的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年毕业后做了助理员，1937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即是使用在史语所积累的资料完成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是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最权威的机

构,尹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然而遗憾的是,青年尹达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很快离开了史语所(他在史语所共六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还与学术有关,但他所选择的学术环境已迥异于史语所。这个转折在尹达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由史语所而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部,从政治上说,他进步了,而从学术上看,他却停滞了,我不评价尹达的人生选择,如果他从此放弃了学术,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尹达一直在学界中,这样他的经历就具有启发意义。

1945年,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过延安,其间曾和尹达会过面。我在台湾史语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查到尹达在准备去北方大学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流露了尹达对史语所读书、研究生活的怀念。信不长,抄出如下:

孟真先生:

安延(案:应为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现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防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

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二月十五日

尹达的这封信约写在 1946 年(他去设在张家口的北方大学之前),距他到延安已近十年。看得出尹达还是钟情学问,但他似乎已感到与当年史语所的朋友在学术上有了距离,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很怅然的,因为尹达毕竟是学问中人,看到当年同道仍在学术上不断前行,而自己却徘徊不进,心情自是沉重,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当指尹达参加的山东日照两城镇西遗址的发掘,他写了草拟报告(未定稿),留在史语所。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当年史语所的同辈朋友中,官做得大的要算尹达,尽管是学术官员。当年从史语所同赴安阳的朋友,留下来的郭宝钧、梁思永,在学术上的贡献都不小,离开的董作宾、石璋如成就也远在尹达之上,特别是同学石璋如,在台湾考古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尹达基本上作为学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郭给尹达的信 25 通,当时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副

所长,而郭是所长。这 25 封信均是郭命令尹达为他处理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看,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 170—199 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30 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 1646 页,1985 年 4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私淑弟子”。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尹达整个学术基础,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然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人却作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1949 年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

辈，按中国读书人习惯，尹达对顾颉刚应该是十分尊敬的。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分子。1928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刘起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7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现在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5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变成了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命资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尹达的延安经历中寻找。1956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讨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好团结。（同上第

359页)但在50年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的心情,总不由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达的所为也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中央研究院”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51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也许这不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过傅斯年吗?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1949年后,尹达写了二十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学术即是为了做官,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钊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到:“在这里我更怀着沉重的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见,到

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言不幸病到无法执笔。卧病医院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382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悔心情,然而也许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曾有遗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意到了尹达一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变化,这些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

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运。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1957年的事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

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1950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40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1909年生人,40年代初也不过三十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岗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

因已有的学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另外就是吴晗是没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古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于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

了《海瑞骂皇帝》。毛泽东4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6月16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读吴晗给傅斯年的一封信

台湾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 27 页中，收有吴晗给傅斯年的一封长信。这封信在以往关于吴晗的研究中都未提及，比如《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3 年版）、《时代之子吴晗》（马紫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4 月版）。另外在许多关于吴晗的回忆文章中，也很少见到他与傅斯年的交往，所以这封信的披露，对今后的吴晗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先把原信抄录如下：

孟真先生教右：

最近有朋友接洽写一本明太祖传，写八万字，稿费一万元，题目很喜欢，钱尤其需要，拟好一大纲，请指教！

一 流浪青年

（一） 孤儿

（二） 小和尚

(三) 流浪的明教徒

二 从士兵到统帅

(一) 香军的小兵

(二) 带兵官

(三) 奉小明王正朔

(四) 从吴国公到吴王

三 消灭群雄

(一) 平方国珍

(二) 鄱阳湖大战

(三) 俘张士诚

(四) 统一闽广

(五) 北伐

四 开国皇帝

(一) 即皇帝位

(二) 大明帝国的规模

(三) 儒生和佛道

(四) 建都问题和分封

(五) 大一统和边疆政策

五 家庭生活

(一) 结发夫妻的马皇后

(二) 一大群儿孙

(三) 他的教养和性格

(四) 老皇帝的悲哀

(五) 身后的纠纷

打算用斯出来轍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的写法，当作一个“人”去写。——我始终觉得这人晚年害“老人狂”，这一病症遗传给成祖，世宗和思宗。其他各帝多少也有这遗传，不过不大显明，次之他和周颠和其他和尚鬼混，不但他自己曾经是和尚，和他的岳父这一系统，作巫师的怕也有关系，至于他自己的祖先，更不用说。关于明教徒这一点，去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曾就三年前在北门外草地上躲避警报时和先生的一次谈话演绎成文，不知先生已见及此文未？如未？当设法寄上一本请教正也。

手头的用书只借到一部明史，十年前曾读高皇帝文集，不过此时此地万找不到此书。其他重要材料如皇陵碑，纪梦，平吴录，平汉录诸书都收在记录汇编，自史所迁以后，昆明亦绝无法得见此书，可否请先生将所藏汇编中关于明太祖史料之主要部分（统计大概十册左右）惠借寄下，预计日写二千字，最多三个月后即可寄还。如不便，亦乞将皇陵碑纪梦二文囑梁方仲君觅人代抄一份寄下，使得有所凭藉，至感至感。

内子袁震近写就《两宋度牒考》一文，约十万字，以《宋会要》及长编为主，已售与社所，得稿费五千元，数月内生活又无问题矣。知注并闻。

又震之姊氏袁溥之住陕甯施乔儿沟天主堂，半年前因病开割需费，无法寄款，曾托其师董必武先生代寄去五百元，最近收到稿费后，即拟将款寄还董先生，惟一问题为挂号信必被扣留，而寄款又非挂号信不可。先生与董先生在参政会必常见面，能代为设法否？如可能，当即将款寄上，否则亦乞示知以便另外设法也。烦渎乞恕，专此敬颂

著安

后学吴晗谨上 十二月十五日

吴晗的命运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有象征性的，这封信为我们了解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提供了许多信息。

吴晗走上学术道路最重要的引路人是胡适，这早已为人熟知，吴晗自己在50年代也没有讳言这一点，尽管他多次说过自己早已与胡适划清了界线，但对胡适给予他的恩情，还是记在心里的。实际上了解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状况的人都晓得，当年帮助过吴晗的人，何止一个胡适。当年为吴晗能进入清华读书并解决生计问题，

翁文灏、冯友兰还有当时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等，都尽过力，还有燕京大学的顾颉刚、洪煊莲等先生，都给吴晗出过力，这些情况 30 年代初吴晗在给他的老师梁志冰的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后来吴晗在自己的《自传》中也说过：“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很大。虽然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读他们的文章却很多，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胡适和陈寅恪的考据、顾颉刚的疑古，都在我这时期的著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虽然因为和另一些人接触，在文章里出现了一些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的话，遭到他们的斥责，但是他们仍然很看重我，以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

吴晗 40 年代的变化，人们习惯上认为和他的妻姐袁溥之有关，因袁氏姐妹当年都是董必武器重的学生。吴晗后来的一些做法，尽管许多人给予了谅解，但如果我们读了这封给傅斯年的信，就会反过来想，一个学者是在怎样的外力影响下，变得不近人情起来的。先说蒋廷黻。当年吴晗去清华的时候，是胡适推荐给了翁文灏、蒋廷黻，蒋当时完全可以拒绝，但一来他们与胡适极好，二来这些学者确实爱才，所以破例以工读身份，让吴晗进了清华。可以说没有当年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就没有后来的吴晗。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吴晗仅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穷学生的时候,帮助了他,而 40 年代以后,华岗代表南方局利用吴晗的时候,吴晗已是知名的大学教授,从一个人的经历看,哪一时期的帮助重要呢?吴晗的治学方法受蒋廷黻影响很大,罗尔纲就明确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吴晗是怎样对待蒋廷黻的呢?1962 年吴晗两次对《北京日报》的记者谈关于研究历史的问题。吴晗这样说:“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买办性很强。……当时史学系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洋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吴晗自传书信文集》223 页)以这样的口吻述及自己的母校及对自己有恩的老师,用什么时代的道德规范来衡量,都是不恰当的。马紫梅在《时代之子吴晗》一书中曾单列一节说清华大学历史系,说到蒋廷黻:“到吴晗毕业并成为正式教员时,历史系的课程已经稳定下来。根据蒋廷黻的计划,吴晗从事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不仅限于考证。吴晗在学生时期的治学方法就显示他已吸取了这种新史学的双重意义了。”

以往我们说到吴晗和他的名著《朱元璋传》时,都要说这本书是如何影射蒋介石的,吴晗自己这样说过,别人也这样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封信的末尾没有年代,但根据各种旁证可以推断

信是1942年写的。当时吴晗在昆明，而傅斯年和史语所已迁回重庆。从信的语气和所提要求看，傅斯年和吴晗之间的关系绝非泛泛之交。特别是其中提到曾和傅斯年在昆明北门外草地上的谈话，可见关系之好。他能将自己将要写的书的细目寄给傅斯年求教，也足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再加上求傅斯年帮忙借书和代为还款，种种细节使人觉得他们之间真是无话不谈。作为学生，至少40年代初吴晗对他的前辈还是十分尊敬的。可后来，吴晗的态度就变了。60年代初他在一篇怀念郑振铎的文章中，还不忘顺便挖苦一下他的前辈傅斯年。他说：“他曾特地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了傅斯年，要求看一看殷墟和其他考古资料，谁知道竟被一口拒绝，不能看。你看，发掘经过多少年了，自己不研究，也不许人家研究，不止是资本垄断了，连学术也垄断了。”吴晗说这些话的时候，肯定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向傅斯年借阅有关明史资料的事了，一个知识分子因时代的转换而偏狭到如此地步，真让人痛心。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学潮，傅斯年当时已是西南联大常委，在处理学潮时，曾和吴晗发生过冲突，两人的关系从此就破裂了。

这几年来，人们常常反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留在大陆的那一批人。他们自己的命运可以说都葬送在自己的轻信上了。对这批人后来的种种变化，人

们早已从以个人的性格、品质来判断是非中走出来，而偏向认为是时代使然，但从吴晗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人的良知和教养在不知不觉中丧失的过程，这难道就没有一点个人的责任吗？

绝望的王芸生

绝望有两种。一种是失去了生存的勇气。一种是对自己所怀抱的理想丧失了信心，肉体虽然存在，但真正的精神已经消失了。我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王芸生的。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三位创始人，除张季鸾 1941 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绝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它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

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所有报纸无法企及的。《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达到的水平，足以让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感到脸红。1949年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论周刊，要算40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这一报一刊实际是当时中国新闻中最活跃的。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三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1949年，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

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傲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

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 509 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 509 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到了这时，他们已无退路，只好听天由命了。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 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

《同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252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

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殖民地，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恪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五十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

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7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痛苦的现实，40年代末上

海《大公报》发行 16 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 年只有 6.3 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里，《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要完了。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并作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 97 辑第 81 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美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 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 81 页）一代报人，就这样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

1957 年，储安平、徐铸成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

1996年第4期第58页)1957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绝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据说70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倡议,但“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60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28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的后记中说:“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公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绝望的王芸生还能怎么样呢?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的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诒、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的绝望是一代报人悲惨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的痛苦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剧色彩。

晚年曹禺

在 1997 年第 3 期的《收获》杂志上,我读到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回忆他父亲的文章《灵魂的石头》,这篇文章是曹禺去世后,我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怀念文字,当然这与作者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女儿,万方是理解自己父亲的,她用真诚的心灵,写出了曹禺晚年的痛苦。

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我以为从作家的角度看,曹禺和老舍是两个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不光是他们在文学上独特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二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虽是两种结局,但内心深处的悲凉是一致的。

我曾听一位曹禺在清华的同班同学说起过曹禺在清华的一些旧事,这位老人对曹禺在文学上的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个性却留有余地。我理解这多是由曹禺晚年的一些事而触发的。曹禺在晚年,做了几件让知识分子不理解的事,尽管只是写几个字,签个名之类的小事,但由于他出身清华又多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活的形象,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不过这失望,读了万方的文章,人

们又会多少能体味到他晚年的处境，其实他晚年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无论是50年代的《明朗的天》还是70年代末的《王昭君》，都让人感到这不再是当年的曹禺了。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田本相《曹禺传》472页）。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对于朋友和晚辈的批评，曹禺是从内心接受的，而且他还把黄永玉给他的信装裱成册，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然而他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在他生前终于没有得到爆发，他在平静中怀着痛苦离去，据说他本来还要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继续扮演一个他早已厌倦的角色，然而生命没有再给他这一次机会……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从冯友兰、钱端升到曹禺、钱钟书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曹禺的身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同于冯友兰，更不同于储安平，他和费孝通有点像，但又没有费孝通那样通达，费孝通是大彻

大悟，而曹禺却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这也许就是他那艺术家的本质，他要真能从痛苦中出来，扮演那个给他派定的角色，也许他的痛苦会轻一些，因为虽然不得不演戏，但在戏完了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能，他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

早年曹禺的话剧不仅征服了当时许多前辈，就是在同时代的朋友中，大家对他的成绩也是真诚佩服的，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曹禺和当时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虽然他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但他的思想倾向与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1944年储安平在给桂林《力报》写的一篇剧评中，这样评价曹禺：“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出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

储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还敬佩他那专心剧作，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这一切到了后来都从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

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由谨小慎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中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但40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意识到无聊的生活面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们诉说

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说起：我已经 80 多岁了，90 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点担心，80 多岁的老人，难道还要非等那个 90 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1949年37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岁，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自由，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

己青年时代的信仰是那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寅恪》第30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年10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才，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煊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傅斯年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要 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汎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年的人生旅途，他是今天年轻一代敬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

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着。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不仅不能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40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的,而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说清楚的。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的委屈求生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三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作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来。1980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

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1994年2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许更加怀念这位建筑学家，如果北京城的规划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办，北京将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人们拆城墙的时候，不会想到他，推倒牌楼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那是一个一切新的都好，一切旧的都糟的时代，梁思成是无能为力的。今天回头一想，人们只好叹息。当时的气氛下，拆了城墙，推倒牌楼，还算是走得不远，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连故宫也应该拆掉。我在1955年10月的《学习》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何祚庥），文中这样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见该杂志17页）我读到这里，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一介书生，除了有专业知识，还有什么呢？

过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经历,以及当年与中国知识界的交往,他不应该退得那么快,或者说,跟得那么紧。1952年梁思成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4月18日),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能泼的污水全都浇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抛弃的,一个读书人写文章自我作践到如此程度,实不多见,但这类文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留学欧美经历的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没有写过这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读的时候,我先是怀疑是否他们亲笔所为,再是怀疑这类文章可能都是组织上逼出来的。这些文章虽然各有角度,但几乎都像是一个人做的。梁思成1952年写的这类文章肯定不止这一篇,这一关他算是逃过来了。

经过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说该是一个新人了,但奇怪的是1954年梁思成在当时《新建设》、《建筑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建筑的学术论文又差不多都是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甚至就是在1952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又说过:“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适履”这样的话,在当年是多么不合时宜呀。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顺

应,甚至公开表态,写文章作践自己,但在内心深处,那些融入血脉的东西,是不愿或想放弃也无法放弃的。梁思成是这样,其他人也大体如此,而且有时你会发现,在当时愈是毫无遮拦作践自己的知识分子,内心好像愈顽固。我有时就想,也许他们早已把作践自己看成一种无法不进行的游戏了,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还在使用自己旧有的武器。

1955年前后,梁思成的建筑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随后面来的1957年,梁思成也逃过来了,在这年的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让人想起1952年他作自我批判的时候,不过这回他批判的多是当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从《新月》的旧账里拿出一些东西,批判罗隆基,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中度过的。眼见着自己早年的朋友一个个从政坛和学界消失,梁思成内心是怎样的感受呢?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17页)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时期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

了,思想改造运动发生过了,《武训传》也批判过了,还有胡适,再加一个胡风,这样就到了1957年。隔过一个大跃进,梁思成就写出了前面这篇文章。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个出身名门,修养极好的大学教授在自己感到万分幸福的时候,难道他的内心就没有波澜吗?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样也是我们想走近梁思成的人的困惑。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将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

入他们的内心,在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选择一种不即不离的生存方式,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应该在现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悲剧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人的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年生人，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弟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人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

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从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

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百年潮》1997年第2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书处听到的,可见80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交往。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

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同事的“撑场而”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

们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沈从文：幸亏没写小说

在旧书摊上见到一册 1962 年 2 期《人民文学》，拿起来看了看目录，见有沈从文的诗五首，名为《井冈山清晨》，就买下来。这五首诗过去在沈从文的文集中见过，但没有细读，这次从原刊处见到，就认真读了，还生出一些感想。

沈从文后来的改业，一直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感兴趣的，经历了坎坷的 50 年代，沈从文由不适应逐步适应起来。1961 年他去了革命圣地井冈山，据说他曾打算在那里住三年，写一部关于革命烈士的长篇小说，但后来终于没有写，只住了三个月就下来了，但此行还是留下了这五首旧体诗。

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后来没再写小说，而做了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在沈从文来说，也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从他那五首旧体诗看，不写小说，也不见得有什么遗憾，甚至可以说不能写比能写更安心些。他们一代作家中，普遍存在一种今不如昔之感，茅盾、老舍、冰心、巴金、曹禺等等，后来在创作上的成就都不如过去，单从年龄和担任

行政职务这些客观原因上,似乎解释不通,我看过这些人的回忆录,他们后来还没有过去忙。作家是这样,学者也如此,像陈垣、汤用彤、顾颉刚、杨树达等人,一生的成就大体还是过去创造的,只有陈寅恪是个例外。时代是进步了,但作家和学者却陷入了苦闷。巴金、老舍还能创作,但后期的创作,今天看来,有生命力的不多。

沈从文没写长篇小说,也许是个遗憾,但从他的五首旧体诗来看,我觉得要是以他过去的的生活,再写长篇小说,已力不从心了,再说就是写出来,也会像其他作家的新作那样,成为一生真正的遗憾。“旧迹似重寻,感旧还歌今。为政在得民,毛选实南针!”按这样的风格写出的长篇小说,读者今天会有何感想呢?

张东荪这个人

90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写了14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

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30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

集中的人大概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国内比较早地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准备写张的传记,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40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张自己也多次说

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俞颂华文集》1991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40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张东荪后来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10期210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

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 214 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 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日甚。1960 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同年 7 月党的 30 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 2 辑 65 页,1987 年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 60 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察》在 4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点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 40 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

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面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

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 1949 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发展。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

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然已养成这样的自

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颖，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七十多首旧体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1886年生人，1973年该是87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再说张东荪

我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曾写过一篇关于张东荪的文章，这之后，又陆续看到一些资料，由于各种人说的张东荪都是自己了解的一面，所以关于张东荪的形象也就各异。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常事，但具体到张东荪来说，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却多是因为关于他 50 年代初的经历本身就没有人能说清楚，而这种说不清楚，并非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因为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张东荪出事在 1951 年，距今已四十多年，按档案法三十年解密的规定，本也应该能够供研究者查阅，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一件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却一直说不清楚呢？这很给研究历史的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单列一节来说张东荪案件，据千家驹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的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

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该书 214 页)根据千家驹的说法,他算是处理张东荪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那么他所记述的张东荪事件是有一定可靠性的,但千家驹 1986 年写作的这本回忆录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比如他说:“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面,做汉奸的幕后军师而已。”(213 页)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当时为了糟蹋张东荪而使用的各种未加证实的材料当作结论了,事实上,在敌伪时期,张东荪坐了六个月日本人的监狱,他的这一段经历,1947 年出版的《观察》周刊曾连载过他自己写的《狱中生活简记》(2 卷 13—17 期),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至于张东荪在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人们也很清楚,至少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与中共打过交道,如果他“一贯反共”,1949 年也就不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了。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可以说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劳的。1949 年 1 月 1 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 页,北京出版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

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同上 58,59 页）千家驹回忆录中提到张东荪的事，有些是当时压力下有人随意揭发的，有些是张在压力之下所作的检讨，多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由于张东荪的历史档案不公开，所以千家驹的回忆被很多人引述，因而也造成了对张东荪的误解。

关于张东荪事件的主要内容，千家驹的回忆是这样的：“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213 页）目前，有关张东荪事件的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有唐振常先生、吴小如先生都在《文汇报》上写过回忆张东荪的文章，但对他的叛国罪，无一说得清楚。张中行在《负喧琐话续编》中也有一节忆张东荪的文字，对

此也語焉不詳，为什么这些同时代的人都说不清当时的情况呢？可见这是一件秘密审理的案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该书 422 页）毛泽东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像千家驹回忆中有关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吴孝武先生在关于张东荪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据张东荪的亲友回忆：“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大，常到城里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其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中国文化》第 10 期 210 页）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我们也就只有推理，出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 64 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

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东荪的遭遇,吴孝武的判断是:“他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以及他的对美政策的主张。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些。

1949年以后,张东荪虽然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但就张一生的主张和性格看,他是主张干政而不参政的,他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谏,才能把一个社会的清明之气唤起来(《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卷13期)。张东荪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从过去的时代中走过来,在新的环境里并没有立即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这就导致他和新时代许多方面的冲突。张中行说张东荪“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独厚的一位。”(《负喧琐话续编》24页)他的好友俞颂华早就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往独来,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俞颂华文集》320页,商务印书馆)以张东荪的

思想和性格推论，50年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呢？在张东荪看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基将回北平时，司徒雷登约见过他一次，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消息之前，听到陈铭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回国的时候，罗隆基同张东荪两个人约克乐伯相见，叫他见到司徒雷登告诉这个经过。所谓“以民盟来做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主观幻想至此彻底结束了（《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30页）。根据这一细节推断，张东荪对于后来的外交政策应该不至于太书生气，但也许是年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他终于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事了。叶笃义就说过，解放之初张东荪就不写文章表态，叶劝他，他说：我要保持我的沉默的权利，可以想见他的性格。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幸运，以他那样的思想背

景和性格特征,躲过 1951 年,还能躲过 1957 年吗?

1952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曾有一个批示,在批示中他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第 422 页)可见张东荪确是一个惹毛泽东不高兴的人。1952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之后,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也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1949 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 60 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206 页,广西大学出版社)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
一个都倒下了。1948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
吁和平》，被开除了民盟，1951年张东荪又出了那事，之
后的运动连续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

吴世昌的选择

我在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作者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吴世昌去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干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加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

“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真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

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很不应该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九·一八”事变后，吴世昌是燕大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七年，前四年是英文系学生，后三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37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

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想象，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载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四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蹒跚，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岁，胡适已44岁。吴世昌

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愤也是建立在对胡适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四天之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 280 页)胡适在信的开头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胡适的日记》在 1933 年 12 月 30 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1934 年 2 月 13 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 11 册,1990 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以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 281 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的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

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十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而当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一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而且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十七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期)、《思想复员论》(3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与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

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十二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十三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十二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在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十二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十二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十二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十三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十二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附。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均经亲复。最近十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三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年9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

《观察》写了大量专论,1948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辑,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年代,吴世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卷16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限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常轨,但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的苦头吃够了,应该让无党无派的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年代,吴世昌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政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 40 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 60 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最终的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 年 1 月,应英国牛津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兼导师。据说当年牛津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 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 40 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 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后,先后发表了《回到了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回国以后,吴世昌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以吴世昌素有的文化素养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国之前,国内发生过的对知识分

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美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的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这恐怕不太可能。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看法。《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而吴世昌的选择就难以令人理解。我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时是否有家庭或其他个人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非常具体的偶然因素,那么我只能说过于强烈的民族情感是吴世昌人生选择的情感动力。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特别是像吴世昌这一代出生于191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他们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又眼见着中国前进的艰难,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种情感,有时几近于宗教性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由于总是民族情感占上风,所以在理智的判断上难免发生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党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是难以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回到祖国四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

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本人不后悔是一回事,这种选择却不能由本人不后悔而变得合乎常理,这实在是发生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件奇迹,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和具有理想色彩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七十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金印如斗大’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页)。

1986年8月31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8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经过八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1995年4月30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一代,大部分是50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年清华,作为一

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 30 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三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 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安福三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

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40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终生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

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 40 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关于蒋梦麟的一件旧事

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收了蒋梦麟的一本旧著《西潮》，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当时和后来在台湾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过去我们这里不大提起蒋梦麟，但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却是一位很知名的读书人。《西潮》差不多可以说是蒋梦麟的回忆录，他记述了现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的经历。蒋梦麟曾做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但他一生最重要的职务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和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常委。

在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中，蒋梦麟是和政府关系较近的，这使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他颇有微词。1945年，他干脆做了行政院的书长，算是离开学界进入政坛了。

蒋梦麟做行政院秘书长之后，还兼任着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本职在西南联大为常委）。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蒋梦麟做了官之后，没有立刻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这使当时一大批教授对他很不满意。因为1929年国民政府曾颁布过一个大学组织法。根据这个法令，大学校长

“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这个法令制定时，蒋梦麟正在教育部任上，可以说是在他手里制定的。当时对大学校长兼职尚留有余地，所以特说明“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可以兼职，但这制度到了1934年修正为：“除担任本校教科外，不得兼任他职。”就是说，做官的人是绝不能再做大学校长的。因此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的秘书长后，就必须退出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当时由谁接替蒋梦麟还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政府和民间都倾向于胡适，但胡适当时尚在驻美大使的任上，而且胡与蒋曾是北大旧识，他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都很推崇蒋梦麟，认为蒋的做官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他只答应代理。但当时国内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此职非胡适莫属，政府也很快认同了这个意见，由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一职，未到任前由傅斯年代理。

蒋梦麟做了官后，曾在昆明举行北大教授茶会。他说他从前未想到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现在他必须辞职了，很有一些舍不得的意思。当时北大教授江泽涵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此事。而力主他辞职的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他（指蒋梦麟）说瞿先、孟真两先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任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江泽涵还说：“他说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

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给西南联大写了辞职信:“谨启者:梦麟业已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所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兼职,自应一并解除,即希察照为荷。此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蒋梦麟的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远在一般官员之上,蒋虽做了高官但心里还是留恋校长的位置。另外,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有理想的一群人,他们无论在大事小事上,总想给国人树立一个按规矩行事的榜样,比如像傅斯年等许多大学教授,并不因为蒋梦麟的位置而可以不守自己定的规矩。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大体代表着当时正统文化所认同的价值标准,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和气质,还是今日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

梁漱溟与储安平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一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社会上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是1909年生人，比梁漱溟要小17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辈的人，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特别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78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中间偏左的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实际上早已不是学者的形象，

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细想起来，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 1957 年夏天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的，此前，他的两个前辈，张东荪 1951 年就销声匿迹了，梁漱溟也因了和毛泽东的冲突，而成了批判对象，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看重的几个前辈，除了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几位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都因为身上的书生气太重，太不知道因言获罪的厉害了，他们一直想用言论来干预政治，最后都因言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1949 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经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度，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都是彼此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来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样的环境里说话的生活，所以这种气质在年纪大的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没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一时很难适应。适应了的是多数，不适应的是少数，可历史正是靠了这少数不适应者的存在，才让人觉得有沉甸甸的分量，不然中国知识分子也就难以让后人表示敬意了。

50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经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这是他难以接受的，当时他的这种态度曾受到时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我发现他早年比较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尽管他在50年代初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还主动否定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但从梁漱溟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一直保持来往的，梁漱溟对储安平的行踪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应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功夫写他。”（《忆往谈旧录》第16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50年代初期，他们彼此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都见不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观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1953年9月1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3页、50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他对储安平是很欣赏的，

1957年4月7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30页)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1957年5月31日日记中说：“储安平□□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637页)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6月1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做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6月1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我们难以知道他的感想了，但从他5月31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言论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的意见的，而以梁漱溟一贯的敢言性格推论，他也是支持储安平的看法的，这样想来，我们未尝不可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遗憾的是他的声音今天还没有得到理解的回音。

陈寅恪与周扬

1949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1959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篻、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年周扬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

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 1961 年

秋在广州见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 1949 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颌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1959:谁在思考/读《顾准日记》

《顾准日记》终于出版了,由《顾准文集》到《顾准日记》,我们终于有可能走进这位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日记是很私人化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真实的心灵记录,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日记的命运作者无法预料。我们眼前的这本《顾准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真诚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个幸存的文本,充满了血和泪,它应当成为知识分子最该读的一本书。

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多谎言,有那么多的大话,但谁在真正关心着中国底层?并思考着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人民?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客,而是一个同样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顾准。

《顾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哀鸿遍野和斯大林主义,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也才能逐步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

1960年1月9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举,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

顾准在日记中不仅真实地记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

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七千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

若说农民留恋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这个称号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饥饿问题。像农村那样“组织集体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动。

顾准 1959 年写于河南商城的那些日记，可以说是他思考中国农村问题智慧的结晶，顾准敏锐的思维，犀利的眼光，使他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超前了后人二十多年，顾准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敬重，除了他的人格力量以外，与他在理论上

的深度是分不开的。四十年前，顾准的思索，今天读来，还让人怦然心动。他说：“从这里，不仅证明了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活力，也证明了宣传与教育的力量。”

“人们硬是歌颂十大建筑，而又以农民的艰苦生活当做献身精神的原动力。”

“应该承认，Stalinism(斯大林主义)是今天的时代思潮，我必须充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我的行动。同时也应该记录到历史中去。”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

“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小型工业的农本主义极不明确，相反，无论大中小的建设目的，都是大会堂式的现代化——拼命的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

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

“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愈为严重。那么，一把卡住农村全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利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

“中国又是一种，而中国较之斯大林为尤左。其实原因也简单，因为集体农庄在苏联已足以解决商品粮食问题，在中国，若不‘组织生产又组织生活’，商品粮并无保障，归根到底这是人口与土地问题。难道社会主义也是愈到东方愈野蛮吗？”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四十年前的声音，虽然不为人所知，但它标志着在那样禁锢的年代里，还有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思索，在追求。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念，使当代思想史不再成为空白，仅此，顾准就足以让后来的知识分子肃然起敬。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思索，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思想家的气质，顾准的意义在于他不仅超越了时代文化的禁锢和物质贫困的局限，执着地将眼光投向世界，更在于他始终怀有对底层贫民生活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读《顾准日记》的时候，我总想到离开他的日记，去看一看他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是怎样感受现实生活的，我想到了《竺可桢日记》。1956年，顾准曾和竺可桢在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竺可桢是早顾准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后来好像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我比较了1959年12月31日竺可桢和顾准同一天

的日记。

竺可桢的日记是这样的，当天竺可桢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宴请苏联专家的晚宴。“膳后已八点半，院预备了游艺节目，有民族歌舞与独唱、钱学森夫人蒋英也唱了两支曲，与游艺并同时进行跳舞。……直至12点。进至1960年元旦时，郭院长已和陈副总理至人大会堂，由张副院长祝大家新年快乐后，又进行了一小时的跳舞，一点始回。……”接下来竺可桢真实地记录了大跃进以后的情况，“酿成阳历年市上买不到蔬菜、肉、蛋的现象”。

就在这同一天，顾准当年的朋友和同事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苏联专家晚宴、游艺、跳舞的时候，远在河南商城劳改的顾准在日记中写到：“长竹园的人们，下午三时左右回来，我虽然吃了十两午饭，还是随着吃了一顿。……八时半，还有一顿糯米稀饭。机不可失，必须去吃。”

朋友们歌舞欢唱的时候，处在饥饿之中的顾准在想什么呢？我想读了下面这样的文字，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被感动的：

东西方相互渗透之说，已为西方学者所传播，苏联的一位作家专门写东西加以驳斥。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我是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的。就算是花岗石脑袋吧。我将潜伏爪

牙忍受十年，等孩子们长大。

.....

继续这个态度，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努力方向。所以要争取经过经济研究所到北大或复大去教书去。现在弄不清的是回京后，如何安排我。到南口去也好，当资料员也好，总比在劳动队强。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候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

我无意责备顾准受难时那些处境尚好的知识分子，但面对顾准为我们留下的思索时，顾准的形象无疑显得高大，别样的知识分子很多，而顾准这样的很少很少，因而我们的思想遗产也不够丰厚，所以今天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格外珍惜顾准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因为这些东西——用顾准的话说：“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顾准日记》就是这样的东西，读这样的书，能让我们找回我们曾经丢失了的东西。

记住这位文化老人

新世纪万有文库中，收了叶恭绰的《矩园余墨》，这不是一本可读性强的书，但它的文化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编者重印此书，我理解既是对一位文化老人的怀念，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记恋。

今天的人已经不大记得叶恭绰了，但在过去，他是一位相当知名的人物，《矩园余墨》的出版说明中说他“尤以善书知名，自郑孝胥投敌后，论书者咸推为国内第一”。叶的一生很丰富，既为官，又做学问，尤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爱之弥深。《矩园余墨》第一篇文章是叶为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写的跋文，记述了他和陈垣等人编制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的经过，读来甚是感人。他说：“我和陈援菴先生垣组织一队人担任这事。其时我和援菴都是赤手空拳，并无机关徒众，不得已凑集一班朋友计六人。正当夏天，冒暑入故宫，逐册去点。以两月时间，居然查完制成这张表。”可见一位文化老人的苦心。叶 40 年代末从香港回到北京，曾做过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50 年代初，为保护明末爱国将领袁崇焕的祠、墓，曾上书毛

泽东，毛还做了批示，可惜未能奏效，袁崇焕的祠、墓还是被毁了。1957年，叶恭绰成了右派，在他这个年纪的文化老人中，这是不多见的，不知是何原因。

最近得读《矩园余墨》才知这是叶晚年的著作。说来也巧，我去年夏天在太原市的一家旧书店里，还购得叶早年的文集一部即《遐菴汇稿》，而且大致读完了，此书一函四册，1930年印制。我所以买下此书，完全出于偶然。我有一位朋友是研究陈寅恪的，他想笺注陈寅恪的诗，所以凡和陈有联系的人和事都在收集之列。他曾托我去北京琉璃厂一家旧书店为他买一部《叶遐菴年谱》，他曾见过此书，但薄薄一册，索价不菲，就错过了，事后一想，还觉应当买下，可惜已不可得了。叶遐菴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私交甚好，陈寅恪的思想和这一辈文人很有关系。我买下此书就是因为这点机缘，而且我见《遐菴汇稿》中收有叶为陈师曾诗集作的序，陈师曾是陈寅恪的长兄，估计总是一部好书。《遐菴汇稿》收了叶五十岁前的大部分著作，有他掌交通部时的文牍、诗文和一些演讲，大体反映了这位文化老人的思想历程，所收史料对研究中国近现代交通、教育史极有价值，而且叶本人的许多思想对今天做学问的人也很有教益，1927年，叶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馆做过一次开学演讲，其中说：“近今裨贩之流，或纂辑占书，迻译外籍，妄摭文义，仓卒成书者不知凡几。为学

当以发明为主，苟袭外人之成书，拾前人之馀唾，欺人欺己，于德于学，两无可取。抑士君子立身行世，自有其道，急功近利，尤与学术独立之本旨相违。”这些话，好像也是对今天的人说的。我不知《遐菴汇稿》后来是否重印过，如果没有，我希望有识之士能重印此书，不仅是纪念一位将被遗忘的文化老人，更是尽一点后人对文化的爱心。

范文澜的无奈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将成为许多历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这两次事件的重要性和丰富性，有关这两次事件的专题研究将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比如“文革学”或“反右学”的研究，现在已初具规模，国内外已有一批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这两方面，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各种历史真相开始浮出水面，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禁区被冲破，这些都为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日益开放的研究空间中，我以为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外，研究者自身在如何使用“文革”、反右中的资料时，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这两次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检讨性文字，由于是在强烈恐惧心理和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还有从1949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还糟蹋自己曾经的师长、朋友、前辈、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自己离开大陆的亲朋密友等等，由于这些东西都已变成铅

字、它们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资料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不应当成为简单的检讨材料，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有良知指出这些曾经出自知识分子笔下不近人情的东西，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将由于时间的推移，使后人难以分辨那些材料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现在许多外国学者研究反右和“文革”时，常常单纯地使用已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并以此为据去推断许多问题，这在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看来，就难免很隔膜。比如50年代初先后两次批判胡适的高潮中，当年胡适的朋友、同事、学生们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能单纯地就文字资料推断是非，到了“文革”时期，这样的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故意讲许多过头话来糟蹋自己的。我在《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读到“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就能想象到他当年的恐惧心态。“文革”之初，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该书234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 and 黎澍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

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 页)

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史学家,经历了 50 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屈从,倒不如看成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悟出的求生智慧,其实那个年代的那类检讨性文字,可能确有真诚的,但我以为多数人是把它作为过关的一种保护方法,对这类东西,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太学究气。

去少留多的困惑

许多回忆穆旦的文章中都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浩回国访问，他曾带孩子去王浩下榻的地方看过老同学，回来以后孩子们不免抱怨，但穆旦批评了他们。穆旦是1950年才从美国回来的，由于他过去的经历，他所能赶上的政治运动无一幸免，几十年以后与从美国回来的同学见面，尤其在70年代初期，稍加对比，孩子们有所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细节不仅发生在穆旦一家身上，可以说在那样的年代里，去留的偶然选择，带给每一个人的都是一页长长的历史，面对这一页页历史，当事人作何感想，我们一时不好妄加猜测，但后辈人却实在是有许多许多的困惑。

1949年之际，对于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都面临一个选择。去还是留，这样的问题，今天的人们也许感到十分严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单纯以理论认识加上教育背景来推断每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

择,他们好像应该是去的,因为40年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由问题上都取储安平著名的“多少有无论”。以这种逻辑推断,他们无疑应该选去的道路。如果历史就如此简单,那后人也就没有什么困惑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具体选择上,出现了认识与行动脱节的现象,现在的重要历史事实是去少留多,而这一少一多之间几乎是不成比例的。就以当时中央研究院院士来说,1948年选出的这81名院士中,据吴大猷统计,去台的有朱家骅、凌鸿勋、王世杰、王宠惠、李济、董作宾、李先闻、傅斯年、吴敬恒九人,在美国的有李书华、陈省身、汪敬熙、吴宪、林可胜、陈克侠、袁贻瑾、李方桂、胡适、赵元任、萧公权、吴大猷共12人(《传记文学》48卷5期56页)。也就是说81位院士中,走了21人,留下60人。张建伟、邓琮琮在《中国院士》一书中有一个统计:“中国科学院在10年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29名。被迫害致死的人员占全院职工总数的0.38%,被迫害致死的科学技术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0.41%。作者还在书中开列了一份被迫害致死的高级科技人员——多数是学部委员的名单,他们是:熊庆来、邓叔群、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曹日昌、丁瓚、周仁、黄武汉、姚桐斌、李璞、司幼东、萧光琰、余柏年、陈绍澧、雷宏叔、伍钦荣、叶企孙、饶毓泰、许宝騄。(《中华文

学选刊》1997年第2期第69页)这还仅仅是科学院一个单位,要是加上各大学的教授名单就更惊人了。而仅在这个名单中,据我所知自杀的就有饶毓泰、叶企孙、张宗燧,还有不在这个名单上的著名地质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谢家荣。

去留一比,困惑也就由此而生。那么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去少留多的现象呢?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执政者的腐败、爱国、对新政权寄予愿望等等。但历史有时是很残酷的,这一群人最终的结局殊非他们所料,但这结局却又很难说没有这一个一个的个体因素。越往下想,越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留下了太多太多让人思考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要再往下想,而听一听当时一个去的知识分子一个留的知识分子的真切感受吧。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闻北平沦陷,中央派飞机赴北平接人,有锡予夫妇名。但锡予夫妇不愿离其子女。……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又梁漱溟时在重庆,余与某君晤,顷已忘其名,由其作书劝漱溟来粤,亦未得复。又罗倬汉陪余同去访寅恪,后余在港办新亚,屡函促其来,亦拒不致。又杨树达,余晤之于广州中山大学,亦不久离粤返湘。如此之类,难于缕举。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

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 242、245、246 页)

浦江清在他的日记中说:“下午心恒来谈,他告知我确乎校方对于想走的同人要给予若干便利,可是他并不想走,因为母、弟等关系。我告诉他,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松,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地近。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南京派飞机接取若干大学教授,抢救到南京,是开了一个名单的,大概各校都有。北大接到这名单(北大应该抢救的教授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位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许多多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为一大悲喜剧。后来傅斯年急了,通知停派飞机。”(《清华园日记》第 265 页,三联版)

从钱穆和浦江清对当年去留选择的感慨中,我们可以多少了解一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一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上产生巨大压力，这压力时间久了，已完全成为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这一两年，大家说陈寅恪很多，对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陈寅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内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内的，也就是说他是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自由的，他没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给人以启示，所以陈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那种完全退回内心

的选择也带有那个时代保持个人节操的特点，对那个时代的恐惧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961年，“香港陈某寄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他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退还。”（该书170页）这是一件小事，但细细体味陈寅恪的做法，却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恐惧氛围给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压力。另一个比陈寅恪还年长的史学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一件几乎和陈寅恪行为完全相同的事。他说：“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晤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学同教两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覆，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静晤室日记》第6954页，辽沈书社版）陈寅恪、金毓黻的这两件小事都发生在胡风案之后，当时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面对外间朋友的问候，居然恐惧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见这一事件给知识分子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无奈的群体

50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因为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写下的许多文章看，这种转变没有合理的逻辑过程，但他们的集体转向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对这种转变基本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我对这种转向是否真诚存有疑虑，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由于恐惧造成的，最近我读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发现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50年代初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和学生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有些摘抄出来，写在了日记中，有些则是原件贴在了日记上的，这些资料，对于了解50年代初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是极好的第一手资料。

胡适在1950年6月1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今天我收到一个林诒昌（去年6月北大毕业）从香港来的一封信，也是题‘五四’。”同时胡适将这封信贴在了日记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这封信中说：“你离开祖国又是一年多了，一年来国家变得更穷困。北大方面，比起旁

的地方来变化还算是最少的,先生们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过得去。……最近朋友来信说,吴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杀,冯友兰先生却到开封谈土改,罗常培先生亦热心,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榘诸先生默默无语。”(《日记》第16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50年代初,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是很苦闷的。1951年11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始学习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胡适,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受到的第一次比较集中的批判,批判胡适的多数是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如钱端升、金岳霖、梁思成、罗常培等人。在胡适离开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的朋友和学生就说出那么多不近人情的话,这不符合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为人处事的方式,可以想见,压力之大。从林语昌信中提到的几位教授看,证之以后发现的材料,可以说林语昌的话是真实的。冯友兰、罗常培当时比较转得快,这有很多事实为依据,比如罗常培后来就在《光明日报》(1952年7月8日)上写了长文《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首先检查了自己过去和胡适、蒋梦麟、陈雪屏等人的关系,林语昌的信是1950年5月4日写给胡适的,两年后罗常培就写了文章彻底否定自己,可见说“罗常培亦热心”一语是符合他后来变化逻辑的。说“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榘默

默无语，”也是准确的，潘光旦和杨人梗都没有像别人那样写文章清算自己和胡适的关系，而周炳琳则更是一时转不过弯来。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中写到：“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其中所谓“对周炳琳的作法”是指，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周炳琳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和周炳琳谈话以后，并由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炳琳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做思想检讨。

从林治昌对几位教授的评价，我们可以感受到在5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如梁漱溟当时就“不肯洗脑”，对此，胡适在日记中说：“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民国八年发愤自杀（也许是七年尾），原因不明，但大致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政

治社会。……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殉道者’(Martyr)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日记》第17册)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加之外力过于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转变了,但内心并不彻底认同,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群体。对于自己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胡适多数予以谅解,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1952年下半年,他在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的前言中,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他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293页)

给胡适写信的这位林诒昌是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到了香港。《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他1948年3月18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这封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诒昌当时还没有毕业,可见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40年代末许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

念的。他在信中说：“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
你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
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资格，因而
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的传统。”（第 353 页）

杂文的忧虑

今日写杂文的人很多，各种报刊已离不开这种文体，读者从新闻和消息中得不到的东西，常常会想到去看一两篇杂文或短论，但现在的情况是并非所有的杂文都能满足读者的愿望，或者说当下的杂文让读者失望的倒是不少。

杂文的兴盛，就文体言，是由于政论这一文体消失了，才代之而起的，政论常常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春秋笔法，但那样写政论的时代过去了。今日的杂文，所以还能吸引读者，实在是没有政论可看，只好选择杂文了。杂文的内容可以说无所不包，但要害在于一个真字。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笔法，总得让人感到你说的是真话，不是为说而说。

现在的杂文难做，不是说写杂文的人江郎才尽，而是杂文的材料多数只是向报刊新闻中找材料、发感想，这样虽也不失为杂文之一途，但变成唯一的道路，就是一件让人忧虑的事情。这样既省事，又好把握分寸，但这样做出来的杂文，分量也就轻了许多，而且容易形成固定的套

路。杂文其实也有一个深入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杂文作者应多从生活感受出发，多从人们的现实处境着眼，多从社会现象的细微处看出时代的波澜，看出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缺失，如果总是由报端的新闻引出感想，习惯了，会把杂文变成编者按语或者新闻的注解，那样杂文也就不成其为杂文了。

互相理解

从事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常常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由于研究范围的限定，研究者必然要涉及到一些现当代名人的评价问题，而一到这些地方，研究者总要提心吊胆。因为历史不是很遥远，这些名人的亲属和后代多数还健在，而且由于是名门之后，在社会中总处于一定的地位，他们一旦发现研究者的失误后，心情很痛苦，于是要么向法院起诉，要么通过各种关系，直接求得要人的支持，常常使简单的事情复杂起来。对这些事情，我是这样看的。

从后代和亲属这一面说，对研究者的失误，首先要表示出足够的理性，要先看研究者的大节，不要仅停留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人爱自己的亲人，世间道理一样。只要研究者是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严肃的文学写作，在他们出现失误的时候，要先与作者联系，告诉他们哪些事实失实了，哪些评价是偏颇的。当然，那些借写历史名人来谋利的人不在此列。

名人的后代都是有教养的，而且名人的后代在过去

的岁月里也大部分经历过坎坷的人生遭遇，他们应该知道有时因为他们的一封信或一张起诉书，带给研究者的后果是多么严重，还有出版社以及许多方面的人都要因此而受到影响。他们应该知道，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人家选定自己的亲人为研究对象，或在研究中涉及到自己的亲人，正说明自己亲人的历史价值，未必是坏事。当然由于研究者的资料有限，或者说就是完全占有资料，从文献中评价人物，和从生活中评价人物，根本不是一回事，作为名人的后代，自然在许多方面了解的情况，比研究者更全面。对研究者的失误，通过学术争鸣，通过沟通交流，通过朋友转达，总会达到共识的，这样对谁都好。作为名人的后代，还要理解，在现在的情况下，做学术研究的人也能够苦了，不要再伤他们的心。

从研究者一面说，我们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学术道德，不故作惊人之论，不追求轰动效应，在资料不足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下笔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下断语，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心存侥幸，在偶然得到一点史料的情况下就匆忙做出结论。

我近年在研究《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时也涉及到许多人物，由于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水平，也对一些历史人物做出过不准确或不恰当的评价。但许多知情者和后代，对我的失误都表示理解，特别是储安平先生的儿女，张

东荪先生的孙子,对我的失误总是及时补正,使我的研究能够更接近真实,更符合历史人物的实际。储张的后代都因了自己的前辈受尽了误会,那些因自己的前辈而位及显要的人,更应该理解研究的不容易,取与人为善之道,这样互相理解,我们就会少一点行政干涉,少一点对簿公堂,这对学术研究是有好处的。

谁来当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应该由学理工的人来做？还是由学人文的来做？经常听到大学里的人有这样的议论，这议论大概是从现实而来的。因为现在的综合大学里，以学理工科出身的人做大学校长的为多。我觉得以学科出身评议大学校长，意义似乎不大。我的看法是不管你是学什么的，但只要把大学真正当做大学来办，就能办好。

过去的大学校长，印象也是学理工科的居多，如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浙大竺可桢、云大熊庆来、中央大学吴有训等等，这些人都是理工科出身，但在他们手里，都把大学办得有声有色，这些校长本人是专家，但同时又都是教育家，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对教授、对学术、对学生、对思想、对自由，大体有固定的看法。1947年4月，竺可桢在剑桥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大学之作用》。共讲了三个问题：一，何谓自由主义；二，为何中国之大学产生自由主义；三，中国之大学如何自由。（《竺可桢日记》第2册1023页，人民出版社）熊庆来做云南大学校长后，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生

命与精神。”所谓“生命与精神”，大体就是竺可桢讲的那些东西。

一般说来，大学校长讲的是个名望，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当年蒋梦麟离开北大后，让傅斯年去做，但因为胡适在，傅就只答应做代理校长，这就是众望所归。傅斯年后来做了台湾大学的校长，声望日隆。他去世后，胡适推荐化学家钱思亮出任台大，殷海光就批评过，说钱不能和傅比，因为钱是一个过时的技术专家，没有思想。

一个大学校长，也好做，也难做，但倘若能做到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舍不得你离开，这就行了，像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熊庆来那样，我们还能有这样的校长吗？

散文还是旧的好

这几年散文当令，写的人忽然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大好事。散文的兴盛与国家的生活状态有关，在六七十年代，很难想象会有散文的生长，那时都喜欢硬的，而散文可以硬，但软大概是它的一个主要功能。说软，并不是说散文只可谈风花雪月，草木虫鱼，而是说它来得随意。谈人生、谈情趣、谈茶余饭后的一些雅事都无不可。除了这些，散文的味道自要减去一半。像鲁迅那样的散文，是特例，不能让大家都把散文当投枪和匕首，鲁迅是旷世的天才，他的文章是学不来的。现在的散文，软的多，硬的少，一方面说是环境使然，一方面又可说是散文的正途，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写的时候，散文还给人太重的感觉，就不大好。当然杂文也不可少，但谁能说杂文是散文的正途？谁能说杂文在时过境迁之后还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像鲁迅那样的文章，至少在他之后的近六十年里，没人写得出，所以说那是特例。

散文的红起来，我以为还是要归功于那些老人。是他们的文章让人觉得好看，耐看。周氏兄弟的文章不必说

了，就是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小品，也让今天的读者看得津津有味，所以，我说散文还是旧的好。新的感觉就差许多。今天写散文的那些名家，有些是由写小说而来，这还好些，至于那些专写散文的作家，就更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的散文大家，哪一个是专写散文的？好像没有，散文是副业，不可专求。由此我想到了最近刚读到的一本书：王力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

这本随笔集是王力先生抗战后期写的，读来很有味道。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家，后来再也没能写出这样的随笔，因为他后来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心境。王力先生的散文，或者说随笔，好在哪里呢？我感觉有二，一是语言好，二是有幽默感。这两面都有来头。王力先生是研究中国语言的，有旧学的根底，他是留法的学生，又能有西方幽默的习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散文有味道。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也是这个路数。可以说，好的散文高手，需要中西结合，少了一面，就觉味道差了点（文言散文，另当别论）。散文还是旧的好，好就好在旧人多是中西文化两种背景，他们又都有自己固定的专业，在专业之外，偶然涉笔，便成佳构，是水到渠成的事。今日许多散文家，少了这个背景，又无专业的素养，写起来就不像。王力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说，自己写正经文章，为了一字要呕出心肝，而写所谓小品，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散文毕竟不

是正襟危坐，薰香沐浴之后才可下手的营生，要随意，先得有一些看家的本领。现在的许多散文家，好像没什么武器，打起仗来也就漂亮不了。新的散文家，现在公认余秋雨先生较好，因为余先生过去不是干这个的，他是戏剧理论的专家，客串一下散文，反而红遍中国。不过余先生的散文虽然自成一格，但也显得硬了些，不是随意可学的，是好散文，但不是散文的正途，就余先生自己来说，那样的写法、那样的题材，也总有他的局限。余先生随意写的几篇，令人耳目一新，刻意写起来，反而差了，比如写山西那一篇，就有许多短处。散文这东西，无所谓大小，也无所谓新旧，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提“大散文”观念，好像过去的散文都是“小散文”观念的结果，那鲁迅的散文是大是小？周作人的是小还是大？还有谈论什么“散文观”，也觉滑稽，一个随意的东西，也要弄出什么“观”来，“观”来“观”去却未见“观”出什么好散文来，所以关于散文的理论也颇值得怀疑。

论战的规则

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卷入笔仗总是难免的。现在学界也好,文坛也好,论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清一色,是打麻将的人追求的,但文坛毕竟不是牌局,我想所有耍笔杆子的人,是不愿看到清一色的局面的。

有论战是好事,但这样的好事却不能由着性子来,这就需要定一点规矩,谁来定这个规矩呢?我看就是卷入论战,或者挑起笔仗的人自己。笔仗在抽象的意义上就是游戏,而游戏是不能没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论战的规则,现在已近似于社会公理,已成为文人的基本道德,缺了这个德,不按这个规矩办事,那我们也只好无话可说,就像流氓睡在绅士身上一样,绅士是不能和流氓论理的,就是论,当下输的肯定是绅士,但旁观者则是清楚的,因为和流氓论理本身就是一种滑稽的事,谁要遇上这样的事,那就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那么论战的规则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条:一是挑起笔仗的人,你写文章必须用真名实姓,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随便造一个名字出来。因为论战是要有回声的,

你不署真名,让回击你的人去和谁论理呢?你既然敢挑起笔战,按理说你不但不怕对方回应,而且应该是期盼对方回应的,真理愈辩愈明嘛。你现在署一个假名字,又想攻击别人,但又不敢坦然走到论战场上来,羞羞答答,这至少不符合论战的基本规则。50年前,储安平办《观察》周刊的时候,特意将“本刊传统”期期印在刊物上,其中第二条即为:“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这才是一个敢于挑起论战的人应取的态度。这是从作者一面说。二说刊物。编刊物的人,不能没有立场,就是主张中立,主张客观的刊物,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立场的。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信仰,这不是坏事,我们不论你的信仰如何,但任何刊物,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人类文明的结晶就是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什么种族的人,在文明的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对一个刊物来说,既然有人写文章挑起笔仗,而且文章还是直接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发,但发表时要遵守规则,那就是文章是谁写的就署谁的名,不能用假名发表,有多少人写,就署多少人的名,这样的文章,就是署一千个姓名,读者也是有兴趣的,不嫌多。再就是你写文章批评了别人,刊物也发表了,对刊物来说,你必须同意,或必须做好准备,就是如果被批评的对方要写文章回应,你必须做

到一是照登对方的文章而且篇幅不能少于挑起论战者文章的篇幅，二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刊载这样的文章。我们办刊物的人，不能先存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来编刊物，既然自认为真理在我手中（这也不是不许可），但你不能不许别人说话，而且在明知道对方不能说话的时候，才挑起笔仗，这不但是不守论战的规则，简直就是不近人情了，而不近人情乃大奸大恶。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人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这样的情绪为何而来，我一时说不清，但我有一个基本看法是无论世道怎样艰难，做人如何不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在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

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三问。周作人出任伪职,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过。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页,北大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长北大,坚决不

聘在伪北大供职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不是人了。

读毛主席的书

余生也晚。“文革”时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70年代初读小学，经常看到毛主席语录，也常从广播中听到毛主席对各种事件的批示，虽然不懂，但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说的话特别有意思，和流行的话语不一样。如他写给李庆霖的信，至今还有印象。“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时听了，就感到特别新鲜。还有他接见留苏学生时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真是讲得好。

岁月匆匆，而今我已过了而立之年，不能说经风雨，见世面，但多少也有一点人生体验。这两年闲来无事，也常拿起毛主席的书看看，感到意味无穷，我尤其喜欢毛主席的批示和书信，有文采、有幽默，文白并用。

如今读毛主席的书，很少去想他讲的道理，倒是比较多地留意他的文字、行文风格以及他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写出这些东西的。

1957年，毛主席有一篇讲话《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其中有这样的话：“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毛主席喜欢用“一万年”这个词，他很自信。“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这是毛主席批示的风格。毛主席的书信、讲话、批示有喜用大白话的习惯，特点是在全篇的大白话中引经据典。但也有喜欢用四六句子的。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就有人们熟知的名句：“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毛主席有极高的文学素养，他的诗词好，文章也佳，但更重要的一点却不常为人提起，那就是他作文章时的心态极好，极自由，这比文学修养更重要。没有自由的心态，再高的素养，也难作出好文章来。陈寅恪先生30年代的名句是：“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先生晚年撰《论再生缘》，开篇即言：“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对偶

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读毛主席的书，听陈先生的话，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还是他们

今年7月9日《光明日报》二版上,有记者采访王铁崖先生的一篇专访,我读后忽然生出一些感想。这篇专访的副题是《访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新当选法官王铁崖》。这是个什么样的职务,我不很清楚,但从文中知道这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重要机构。担任这一职务的通常是国际知名的法学家。今年当选的王铁崖先生已是84岁高龄了,而他的前任也是一位中国法学家李浩培先生,今年已91岁了。

由于有两年一直研究《观察》周刊,所以我对当年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特别留意,如能见到他们今日的文章或其他动向,我都要收集起来。

当年给《观察》周刊写文章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学有专长的教授,那时还在青壮年的法学家有三个人比较活跃,一个是韩德培,一个是王铁崖,还有一个是楼邦彦。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钱端升先生的得意门生,曾有人说龚祥瑞、王铁崖、楼邦彦是钱氏门下的“三剑客”。而比他们年长的李浩培先生,在《观察》时期是很活跃的一位撰稿

人。李浩培先生、韩德培先生，还是列在《观察》封面下的78位撰稿人之一。韩德培先生今日还在武汉大学，他是他所属专业中的权威，韩先生一生几篇打天下的文章，都是在《观察》周刊发表的，如《我们所需要的“法治”》（1卷10期）、《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1卷24期）、《论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及征用的技术问题》（3卷3期），文章之锐利和无所畏惧，读来让人很是敬佩。比韩先生小几岁的王铁崖，在《观察》写过《论立法院与条约权》（3卷2期）、《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4卷11期）等文章，当年韩先生、王先生也只是三十出头的人，除了专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和热情，远非今日的青年所能相比。今日看到84岁的王先生获此荣誉，感到历史总是公平的，过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到头来还是他们，李浩培先生之后是王铁崖先生，这多少让人们感到了一种安慰，因为他们那个专业是很危险的，有许多年没人敢碰，1957年这个专业中的人多数都躲不过，李先生和王先生总算是挺过来了。

王铁崖先生已是84岁高龄，我知道这个年龄的意味，他们的教育是在过去完成的，是在当年的清华和英国完成自己学业的。国际上看重的是王先生的什么？我们这些局外人不好多说，但我想问一句，王先生之后，我们也培养了不少法学方面的学生，联合国怎么不选一位年

富力强的人去代替王铁崖先生呢？这中间肯定少了些什么。想当年，法学和政治学、社会学一样，都属于消失了的学科，再恢复起来，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了，而这二十多年，一个年轻的法学家已不可能有王先生、韩先生他们当年打天下的朝气，所以从国际法学界的情况看，还是王铁崖先生、韩德培先生他们的天下，这个历史的循环，包含着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五四人物的职业

最近才读到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文译本名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先生这本著作在海内外很有影响，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必读之作。由于手头还有其他工作，我还没来得及细读，只粗粗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来。这感想是我留意了一下五四人物的职业，抚今追昔，感到五四人物还是幸运的，生逢其时，他们多数都成就了一番事业。

说五四人物，我还是在较窄的意义上说的，不包括当时的大学教授，只说它的学生；学生又分两种，一是当时“新潮社”的成员，二是五四那天上了大街的人。这些人后来都干了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选了什么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呢？五四人物的职业大体是两种，学者和大学校长，往宽里说，就是学者一种，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成为大学校长的。

成为学者的有顾颉刚、毛子水、江绍源、杨晦、汪敬熙、李小峰、俞平伯、郭绍虞、孙伏园、张申府、冯友兰、朱自清等等。有意思的是当年几位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都

成了大学校长，如罗家伦先后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傅斯年先后做过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做了青岛大学的校长，匡互生做了上海立达学校的校长。做了大学系主任的也不少。中国的学生运动领袖，出路都是学者，是很令人深思的。1945年傅斯年到昆明处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傅是西南联大常委，冯友兰就和他开玩笑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三松堂自序》）其实当年南京政府派傅斯年去，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曾是五四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又是国内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还是公认的办事好手，有了这些资格，傅斯年才敢去昆明。唐纵在他的日记中也说过，要是胡适在国内，他是最恰当的人选。

经典的魅力

今天让非专业的人去读一本《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怕是很难有什么反应的，至少个人的阅读经历告诉我，这类书版本繁多，但多数大同小异，读了蒋廷黻的名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才知道同样是近代史，也还有别的写法。蒋廷黻的这本书，被东方出版社列为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中的一本，真正是当之无愧，遗憾的是他们对原书多少动了一点手脚。

好几年前，我就听一个朋友讲过，大意是钟叔河先生说，这是所有近代史中写得最好的一本。这个话我一直没忘。1987年，钟先生主持岳麓书社的时候，就重印了这本书，可惜我没有买到。1994年钟先生给海南出版社主编“人人袖珍文库”时，又印了这本书。我不敢断言那位朋友转述的钟先生的话是否确实，但钟先生喜欢这本书当是无疑的。近代史很多，人也各有其爱，喜欢一本旧书，这也是人之常情。

蒋廷黻过去做过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后来也在政府做过官。他的这本书，据他自己说：“是民国二十七年

五六两月起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蒋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原想用十年工夫写部近代史，但抗战以后，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现在这本书，只是“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这本书字数约十几万字，比人们熟悉的那些高头讲章少得多，但这是一本有学者自己独立见解的学术专著，绝非强词夺理的教科书。

学术著作要紧的是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而这些真知灼见当是学者自己从研究中得来，不能先存了什么理论和主义，再去从资料中断章取义。蒋的这本近代史，从我个人的读书兴趣看，真是一本合口味的书。蒋是历史学者，但写起书来很平实易懂，从文字上先让人有亲切感，想看下去，观点如何且不论，光说蒋的文风，就是既有个人风格，又绝不故弄玄虚，完全可以作为散文来读。且看说恭亲王的一段：“奕訢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几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

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这本书大体就是用这样的笔调，很是好读。

这书的另一特点是合情合理，让人觉得是那么一回事。我过去也读过一些近代史的教科书，不但味同嚼蜡，而且不合常理，历史中的人物多数是按需要写出来的。而在蒋的笔下，历史的每一环节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叙述历史的人不是存了心要让读者越看越糊涂，他只想告诉你当时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蒋廷黻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望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该书 129 页，台湾传记文学版）

蒋廷黻的这本书很薄，但读起来却很有分量，从行文的顺畅和结构的谨严上可以看出作者对所叙述的历史真是烂熟于心，而又见解迭出。作者叙述的是历史，但又融入了个人的情感，不是那种颐指气使的训人口吻，而是满

怀深情的由衷感叹。他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蒋廷黻用几万字叙述的中国近代史，比有些几十万字的教科书更有生命力，真正的经典，自有它的魅力。蒋廷黻的书虽只有几万字，但他是在真正的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在清华时，他就出版过两卷《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中国近代史是真正下过功夫的。要想了解中国近代的变革历程，不妨先捧起这本不足二百页的书来。

怎样了解过去

一个民族的传统是很具体的，后人要知道真正的传统，一般需要读书，需要在情感上有一个回到过去的心境，这样我们才能多少知道一点真正的传统。我过去读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就发现自己从报纸上课堂里了解的传统是片面的，或者说这不是真正的传统。钱穆特别强调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过去梁启超、梁漱溟也有这个看法，我觉得这比较合乎常情，合乎常理，也合乎一个民族文明进程的轨迹，要是大家天天斗争，就不合常识了。后来又读过余英时一篇传记，他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东北乡下的一段时光，真是温暖如春。我们后来了解的传统，我感觉主要是不近人情，不符常识。前一段看《蒋廷黻的回忆录》，他说：“中国有些伟大事，即使是在那个贫穷、落伍、分裂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在贫穷残酷斗争的中国社会中，中国人还很讲面子，对正义君子大公无私的人还很尊重，对于慈善事业愿意伸出援手。这是中国历来的遗风，它使中国能在所有的灾难中屹立不摇。”我感觉他说得很好，这才是传统，因为它

强调的是爱,是和,而不是斗,不是仇。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下,我们的文化才得以延续。李济在一篇回忆他与中国考古工作的文章中说:“那时候的留学生在选择课业方面很自由,爱读什么就读什么,就连清华的‘官费’,对于它资助的学生,也没有学科的限制。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活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想一下,如果一个地方的人,特别是文化人都以急于离开这个地方为幸事,那出问题的可能不是留学生,而是那个地方。我在做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时,曾有一个统计,光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从1909—1929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每一个年度的留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这样的连续性,才能保证一个大学的活力。

珍惜思想遗产

《顾准文集》的出版,使许多人了解了这位在黑暗中思考的知识分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热烈地谈论顾准,谈论他的精神,谈论他作为知识分子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最近《天涯》和《百年潮》杂志,分别摘登了一部分顾准的日记,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们走近顾准,走进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提供了一条路径,这样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顾准的经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得不少了,但他在黑暗的日子里,用自己大脑思考的问题,有许多在今天还是盲点。前两年谈及顾准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很不以为然,一是认为他的思想尚有局限;二是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多了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时下也还有人继续这种说法,以为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多了,而科技人才不够。不知说这些话的人,是从哪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从这些人的内心看,大概还是以为身为知识分子喜欢坐而论道,除了添麻烦,实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吧。但现在的问题,恐怕未必是这样。

顾准本来是一个会计专家,这种纯技术的职业,按说是日后混饭的好手艺,顾准早年出身于中国现代会计史上著名的立信会计事务所,是潘序伦最看重的人,二十几岁就出过多种会计学方面的专书。像这样有看家本领的人,在历经磨难之后,通常的想法都是,国家事管他娘,重新干起老本行,但顾准就不同。1971年他在河南息县时,是这样设想以后的:“一旦摘帽,方毅那里的信是要写的,关于会计、管理的‘文章’则不准备写了。……会计、管理固然是一个方面,倘若沾手,会占去我全部精力。63~64一年间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现在想想我那儿章‘会计学’草稿,实在一无是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还确实要有一个班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准备长期搞下去,并不是‘浅尝辄止’所能解决的。这样,陷下去容易,拔出来就难了。”在顾准那里,他所抱定的理想是思考比会计学更重要的问题,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有比会计学更需要贡献智慧的东西。同年在息县明港,他又写道:“然而出处如何,又不抱幻想,所不能忘怀的,还是追求真理。倘若还能活20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蕘之献而已。”

现在披露的顾准日记,还只是一部分片断,如果顾准的日记能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那对人们了解顾准的

思想遗产是非常重要的。顾准在日记中说过：“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以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我们不能让顾准用生命写出的东西，永远无法和读者见面，我们本来缺少珍贵的思想遗产，不能再不珍视了。

毕业论文

我喜欢看过去的档案，这些尘封的资料中往往传达着时代的信息，也具体展示着时代的文化精神。其实真正的传统就是由过去的习惯构成的。刘述礼、黄延复先生编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一书中，收有许多 30 年代梅先生主持清华大学时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些东西都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但这些旧事，今天看来，不但没有旧的感觉，而且还让人浮想联翩。就说学生的毕业论文，我看今天大学里的人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要求，恐怕就远不如当时严格。这看似一件小事，但经年累月，它所造成的文化习惯，直接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很难说是一件小事。

这两三年来，学界违规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社会科学界有，自然科学界也有。正是由于我们没有规范，才使得许多中青年学者和科学家强烈呼吁，要重建学术规范和遵守科学道德。但呼吁是一方面，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则又是一回事，我个人认为，重建学术规范，从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抓起，是一件基础的工作，只有从

一开始走上学术道路,就养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习惯,以后才不会“荡闲逾检”。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好传统的,现在应该恢复起来,让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懂得,我们的前辈在这些方面曾经为我们留下过宝贵的遗产,我们不能再去漠视它了。1936年编制的《清华一览》中,收有一篇《学生毕业论文细则》,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做了非常详细严格的规定,比如第六条中就有两项这样的规定:“论文中引用句出处,须注明著者、书名、版本、出版处及页数。论事之末须表列所用参考书,列明著者、书名、版本、出版处。”这些规则后来被人忽视了,直到最近几年,各种学术刊物才有这样的要求,而许多学者早已不习惯来这一套了。现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由于要拿硕士学位,有一专职导师指导,似乎多少还有一点规矩,至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多数是一个导师指导几十人,而又没有严格的规定,据我所知,多数本科毕业生的论文,不是读书的心得,而是东拼西凑的抄袭之作。学生自己不重视,老师学校也不严格要求。而过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按清华的规定:“所有论文,均向所属系主任呈缴,经评定成绩,送注册部登录后,转送图书馆贮藏。”而今天本科毕业生的论文,大概没有这么严格要求的。学术失范,学术道德水准的下降,和一开始养成的学术习惯是有必然联系

的,今天还有谁将抄袭一篇毕业论文认为是奇耻大辱呢?这个规矩没有了,一切都习以为常,长时间积累下来,就造成了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我认识一位毕业好几年的大学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他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大公报》的,可当我问起他《大公报》的情况时,他说他做毕业论文时,连一张《大公报》都没看过,居然也过关了。这样的情况,在今日大学里已不奇怪,这确是值得忧虑的。

学生的气质

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学生气质的文章，所谓学生自然是大学生，所谓气质当然是精神气质。我的这个感受是从一件小事产生的。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和一位朋友闲聊，中间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学生。这位学生是这个朋友的朋友，由于喜欢写作，走动很勤，我这位朋友也很欣赏他在写作上的才能，觉得将来他还能吃写作这碗饭。但这位学生这次来却没有谈写作的事。他知道我这个朋友过去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几位已经是省一级的官员了。这个学生毫不隐讳地求我这位朋友，看能不能设法帮他引荐一下，给官员做个秘书之类的工作。我的这位朋友当着我的面就回绝了，而且说了一些实话，让那个学生很下不了台。

有了这点对学生的了解，我也很生感慨。今日的大学生从素质方面说，肯定比他们的学长们有了提高，但在精神气质上，似乎是务实超过了理想，愿意关注眼前而不愿多想未来了。俗世的生活是很诱人的，追求俗世的生活也无可非议，但这里有一个年龄的问题。一般说，人过中年

以后，意志容易低落，人生阅历不断丰富，看惯了一个个理想的幻灭，转而追求一点俗世的生活，这是常见的，过去如此，今天也这样。仔细想想，这几年主张直面俗世，躲避崇高的人，大体也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对青年人来说，如果也选择这样的人生，从一迈进社会，就抱定这样的理想，我总觉得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少了点什么，如果我是一个父亲，当我的儿女也要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人生还有比这更丰富的内容。我们常说，一个民族的希望在青年，因为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但当这八九点钟的太阳已无力发出耀眼的光芒时，这个民族的前途不是很让人忧虑吗？

十几年前，我从一个小县城的师专毕业时，也有同级的人被分去给小官员做秘书，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当然那个职业总是要由人来做的，本身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倘若一个青年人把这看成是最有利的进身之阶，那就有失人格了。

大学生还是要先有人格，先有独立的头脑，再去想从事什么职业。哪怕中年以后理想破灭，也不能从青年时代起就放弃理想。我一直不愿听到直面俗世之类的话，俗世生活，三十亩地一头牛，吃中国菜，住欧洲房，娶日本老婆之类，虽程度有别，但这些东西与人的本能极近，不用学不用思索就会，而崇高不容易，但谁还不会堕落呢？

向上是精神气质，谄媚是什么呢？说真话不容易，说假话谁不会呢？对大学生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正义的性格，这样的精神气质才能闪现出思想的火花。

过去的大学生辩论

前两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辩论,不管怎么说,意义实在有限,辩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

费他们的才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40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2卷第10期上登载了一篇当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当时是1948年12月28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去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辩论，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又不这么简单。

自传的可信与不可信

现在许多人喜欢读名人的回忆文章或整本的自传。回忆录和自传差不多已经成为研究者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常见研究者以研究对象的回忆录和自传来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某种结论。我自己也喜欢读这一类东西，觉得总比第二手资料更可信，更真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对于回忆录和自传一类的东西，我还有一个看法是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不是说写这类东西的人在故意骗我们，而是说人性中的弱点可能会使写这类东西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一般说来总是对自己不利的或有损于自己人格的。这时候就需要旁证，如果有同时代人的其他回忆不妨对着看，如果能有关档案一类的东西就更好了。原始档案虽不易得，得到了看起来也费事，但对研究来说，这比回忆录或自传一类的东西要客观，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冯友兰晚年撰《三松堂自序》，人们评价甚高，研究冯的变化，这是一本不能不看的书。但这本冯先生晚年的自传也有漏掉的重要细节。试举一例。台湾刘绍唐先生编过一本《永怀查良钊先生》的集

子,其中有一篇查良钊的文章《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这篇文章是说冯友兰的。1951年11月1日冯友兰曾访问印度,时查良钊也在印度,但在一次聚会上,冯友兰见到查良钊一句话也不说,起身就走,使当时在场的人很惊奇。冯和查是20年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几乎天天见面,他们的妻子是好朋友,孩子在同一所大学读书。

冯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述50年代经历的专章,但这个细节没有提,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写出来有不当处,而这个细节对于研究冯友兰在多次政治运动中的变化以及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单看《自序》,不做旁证,难免会得出远离事实的结论。

《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三)中收有张奚若给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是关于政治学家萧公权的。抗战初期,清华先迁到湖南长沙与北大、南开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清华聘了萧公权为政治学系教授,但萧一直未到任。清华盼他回授,所以不予计较,给以休假权利,当时萧公权也答应休假期满后回校服务,绝不食言,但萧最终未归。张奚若这封信就是请梅贻琦校长处理这件事的。当时萧公权以休假待遇,曾领有清华的薪金,他说如果校方认为需要退回当照办。张奚若在信中批评了萧公权有侥幸心

理，认为应当主动退还，为维护学校计，张奚若请求从自己的薪金中扣除，以维校章，并附上了萧公权所欠学校的账单。

萧公权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学者。晚年撰《问学谏往录》一书，回忆自己的经历，言及清华及抗战初期在西南的情况甚详，但对于上面提到的事也只字未提。而这类事情，要说是忘记，则难以令人相信。萧公权出身清华，又为她服务多年，抗战军兴改就四川大学教职，都是人生重要关头，应该留有印象的。

回忆录和自传都是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但在使用这些资料分析作者的人生经历及道德水准时，最好依靠一些其他资料，隐去一些自己不愿提的事不是什么缺点，是人性的弱点，大家都一样。

西南联大的启示

我在看《观察》周刊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关于西南联大的资料，感到很受启发。近年来，国内学界谈知识分子问题的人很多，谈来谈去，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个人还可以，作为群体则不行。我以为这是不全面的，至少西南联大的存在可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有过成功合作的经历，对西南联大作个案研究，会使人们对中国的大学教授有一个新的印象，我们应当了解联大的风格。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合作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不少，但只有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存在时间最长，前后坚持九年，并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当时许多人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

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还有三位卓越的校长。

在战争环境下,可以想见,大学的搬迁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西南联大先在湖南长沙建立临时大学,两个月后又迁昆明,没有足够的忍耐精神,是难以想象的。据当时的一份材料,临时大学迁昆明,共有 224 人,1937 年 2 月 20 日从长沙日清码头出发,至同年的 4 月 27 日到达昆明,历时六十多天,行程 1663 公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教育界少有的壮举。

当时聚集在西南联大的大学教授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这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而是有直接的生活体验。

二、有比较好的国学根基,对中国文化精神有较深的理解。

三、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在政治上一般能接受民主和自由思想。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作为大学教授,主要责任在提高学术、培养人才,所以在军事危急,物质生活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仍能弦歌不辍,孜孜育人,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同时,他们对政府的缺点,敢于直言批评,起知识分子应起的作用。这些教授从欧美留

学归来，学有专长，许多是一代大师，富有绅士的宽容精神。

在西南联大，也同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团体都不在学校的行政上有什么争夺。清华、北大在学术上本来是很有差别的，但合在一起并没有清华、北大、南开之争，更没有因此而争夺院长、系主任职位拉帮结派的。在联大，可以说是有派系而不大有派系之争。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所以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教授们总是为学术而努力。

联大的和谐是由容忍和民主精神造成的。联大这个自由堡垒的中心精神就是容忍。他们懂得，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是不会有民主和自由的。清华、北大、南开历来以宽容精神见称。北人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有这样宽容的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还有清华，重要的问题都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有半数以上的人是从教授中选出来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容忍精神，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是不大可能的。联大容忍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它在政治上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如闻一多、曾昭伦、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陈序经、冯友兰、钱端升、陈岱孙

等教授,在政治上有不同见解,但并不影响彼此之间在联大一起共事,是联大的容忍精神,使各种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学术上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术派别。政治上的不同意见,并没有影响他们尊重别人的学术成果和人格。

联大的成功合作,离不开三位校长的努力。南开张伯苓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经考察过日本的教育制度,一生都为教育事业奋斗,战时中国大学南迁的举措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张伯苓主要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另外北大的蒋梦麟校长,早年留学美国,获过博士学位,清华的梅贻琦校长,也是留学美国的,他们两位对于教育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蒋校长负责对外事宜,而梅校长负责校内的事务,彼此分工合作,为学校创造了和谐的气氛。他们三位是中国名符其实的教育家。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得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

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诚哉斯言！

不是责备文人的时候

《读书》1993年8期刊有吕澎先生《最是文人有自由》一文，拜读之后，有一点感想，写出来求教。

说实话，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现世空间中，我完全能够理解吕先生的心情。作为一家之言，吕先生的“提醒”和他开出的药方自有道理，说无可奈何也好，说逃避现实也罢，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吕先生文章所传达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多数文人既成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无可指责，但必须指出，这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况且对于当代文人目前的精神状态来说，与其说是自觉，不如说是无奈。何以“最是文人不自由”能引起很多人的感叹，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却被许多人忽视或有意没有提到，那就是今日文人言及自由时实际上既不同于西方人，也不同于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人和洋人做得到的事，今天我们还做不到。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日文人的自由空间是大，是小，想谁也不会如吕先生那洋潇洒地说出“最是文人有自由”吧。吕先生没有触及那个重要问题，这自然可以理解，但绕开这个问题，指

责文人从事文化批判，就实在有些不帮自家兄弟忙的味道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吕先生是要告诉文人，从政与做学问是两回事，各有各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文人不守自己的规则，总愿意进行文化批判或“煽起道德主义的激情”。我感觉吕先生对于文人过苛。吕先生是文人，但处处责备文人不懂政治的操作技术，很显然，他在责怪文人议政的时候，是以从政者的眼光来看取文人的。现在我向吕先生请教，就算文人不懂规矩，那从政者遵守规则吗？姑且不说对文人的规则和从政者的规则是否平等，单就规则而言，也是先有从政者的犯规，才有文人的议政吧？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我不想再多引述西方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我只想说，文人议政，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责备的，今日来责怪议政的文人，我真有些难以理解。书生议政的幼稚是谁都能见出的，这种现象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议得如何，而在于能不能议，敢不敢议，议了以后又怎样？这里要紧的是一股“士”气。政治常常是不透明的，在其中的不议，不在其中的想议，你在暗处，我在明处，本已没有平等可言，所以幼稚自然难免，但在幼稚之下，却也常有终极的深刻之处。事事皆对，毫无差错，不是太为难文人了吗？1947年，储安平写了著名的《中国的政局》，梁漱溟看了

之后就给储写信：“本来政局真相，外间人多不知道。过去一年余国共和谈经过复杂，虽我们稍曾与闻其事者，有时也弄不清楚，其他更无论。一般人对于事实既不明白，则与孰是孰非，更难分判。因此亦就不能发生有力之舆论，以督促时局问题之解决”。（《观察》第2卷第4期）在当时来说，从梁的角度看储，就一定会指出储的失误，因为梁在其中，而储在局外。但梁深知议政之可贵，所以尽管多有失实之处，他对储文的评价还是“其中大半可以同意”。吕先生今日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想读的书”正是多少文人议政的结果。在《中国的政局》刊出后，当时还在美国的陈衡哲也给储一信，登在《观察》2卷3期上，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几乎与我们面临的相同，信不算长，抄在下面：

安平先生：《观察》二卷二期大作《中国的政局》已仔细拜读，不胜同情钦佩。……所记关于自由思想分子的一节，可谓真知灼见。惟问题是：政党既必须借重权力才能发挥力量；而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又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则假使要他们用权力来组织一个政党，用利害来维系她，这不正与那个传统精神相反？这不是吃热的冰淇淋？对于这个情形，在来读大作之前，我也曾常常苦思过；但

结果总觉得，政党这条路不易走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因为冰淇淋若热了，便已失去她的中心价值；故自由思想分子在目下的迫切使命，似乎不能以正常的方法来发挥。我们用西方文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则大概可得到下面的几种类似：（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袖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故我以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妨是看英国的政党；但远水不救近火，自由思想分子的最近将来的使命，恐怕仍须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道德及思想方面）；然后再由此企求达到最终目标。至于如何方能达到这目标，则虽非此信能畅论；但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似乎可以先把此问题的主要症结，先做一番考虑与研究；第一，如何方能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传统恶习惯？第二，如何去栽培那“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第三，如何去造成一种稳健清洁的舆论，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会上的道德支持（哲近年在论文中，曾不断地论及社会公道的重要性；即是有感于中国社会的缺少公道，而主张公道者之饱受孤寂与侮辱也）。此三个条件有一不

具，自由思想分子就决无结合的可能，而更不用说组织政党了。

文人议政曾经是被嘲笑过了，也常被现实所嘲弄，但这不能成为文人不要议政的理由。被嘲笑，不等于没有价值，不合时宜，不等于不可贵。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要考虑某种正确的东西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有价值，但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不能这样，否则一个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的区别就没有了。行政官员考虑的是某种东西在实际运作中的可行性，而知识分子操心的是一种终极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幼稚的、可笑的，常常错；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他们是成熟的、值得尊敬的，总是对的。

文人难过皇帝关

英雄难过美人关。

文人难过皇帝关。

第一句是俗语，好理解，用不着多说。第二句是我杜撰的，需多说两句。

中国文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这是个好传统，也是个坏传统。这个“知己”如果是在野的人物，这还不要紧，如果是在朝的人物就复杂了，要是“知己”成为皇帝，“士为知己者死”就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皇帝一般都知道文人这个毛病，所以也懂得礼贤下士的传统。人都想把事情做好，皇帝也一样，但想做好是一回事，真做好又是一回事。

文人是靠笔说话的，只要能说话，就要说真话，不能说真话，就不说，千万不要说假话，更不要说不疼不痒的话，不是说真话的时候，沉默总还是可以的，要是沉默也要杀头，那说一点违心的话也可理解，但现在不是这种时候。

文人的毛病很多，但要命的在这“士为知己者死”——

条。有多少文人,未遇知己的时候,有独立性,敢说话,一遇知己,就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一点中国的文人,就不如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文人,在野不行,禁锢太多,难以发挥作用,一肚子学问,找不到顾客,没办法,只好售予帝王家。可一旦找到这个买主,文人那点独立性也就没了,这样的例子古今极多。陈布雷当年作为报人,是一支好笔,后来做了皇帝的秘书,这支笔就不灵了。陈布雷自己知道自己的处境,但他有旧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没办法。直到死前,他还在《上总统书》中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其无负教诲。”(《陈布雷回忆录》第149页,台湾传记文学版)没有知己不行,有了知己也不行,真是矛盾得很。钱穆是大学者,未遇蒋介石前,说话就很直,但自从抗战中在四川青木关和蒋介石共进晚餐后,再说话就有了余地。待到办新亚书院,花了蒋介石的钱,就更被动了。再后来回台定居,住的是政府给的房子,短处就更多了。李敖在他五卷本的《蒋介石研究》中,专列一节“钱穆和蒋介石之间的一些臭史”就抓住了他的知遇之恩,并说:“我越看他,越觉得他可耻。”抗战期间,许多文人都有过类似钱穆的经历。皇帝对文人好,人都是具体的,天子圣明,不动心不容易。当年冯友兰被请去中央政治学校讲课,心情也一样。还有贺麟,不但被邀去讲课,还给了钱,让建立“外

国哲学编译委员会”，不能说不好。知遇之恩是非常具体的，要超越，良心上总是过不去。总过不去，也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至今不绝。

旧书店

这一两年，对旧书店的认识已越来越清楚，人们一致认为，这东西少不得，它不是所谓新书店的补充，它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对读书人来说，在这个世界里获得的乐趣和学识是新书店所无法比拟的。旧书店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国家文化兴盛的表征，是一个民族对于已逝历史的温情怀念，旧书店是活着的历史。旧书店的消失，牵动着读书人的神经。1951年，陈寅恪听说琉璃厂书肆，卖旧书的都改卖新书了，曾写下一首沉痛的诗。陈寅恪从旧书店的兴亡中，看到了文化的命运，这是穿透历史的眼光。

旧书店的文化意义在于这里没有什么禁区，由于旧，而旧在一般人看来就是破烂，不成系统，没有规模，所以在这个世界里，无论外在环境如何，这里总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因为我们不能规定什么书不可以在旧书店里出售，就如同我们不能限制收破烂的不能收购哪些破烂一样。徜徉在旧书店里，人们常会感受到生动历史带给你的那种也许是温暖，也许是痛苦的回忆；你可能见到你喜欢的

作家学者的旧著,偶然翻翻,就能让你浮想联翩。我曾从旧书肆中买下许多右派言论汇编的白皮书,也买下许多“文革”时的文艺刊物和学术刊物,这些文艺和学术,今日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能让人去感受那时的历史为何是那般的变幻无常,让人不可思议。

旧书店的常客是两种人,收藏家和学者,收藏家想从丰富的收藏中看出历史的价值,而学者则想从他们所关心的零散资料中找出历史铁证。旧书店里无穷富,一册廉价的小书,也许正是一个收藏家久觅不得的企盼之物,那时他们是不在乎什么价钱的,一页过时的旧报,也许正有一个学者所需的历史资料,这时它的价值也就不再是一张发黄的报纸了。有钱人在这里不显得富有,因为总有你买不到的东西,穷人在这里也不寒酸,因为再穷也有你能买到的一本薄书,谁又能说这一册薄书的价值就在那些名贵版本之下呢?当然这是在知识的意义上而言的。

没有哪一个学者不喜欢逛旧书店,这种习惯,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北平时代的旧书肆也成了遥远的梦想,停留在那些学者的笔下,但我希望旧学者搜旧书的病还是能够传染开来,因为这实在是一种真正的文人病,我愿旧书店能成为我们生活里一道永远的风景。

普及吴祖光

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钟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过“普及钱钟书”,但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大

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的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

遥想教授当年

1994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

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

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 1938 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赏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熏陶。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过去的教授

1995年3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

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的旧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

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 1949 年前 100 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

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生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情况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三百至四百元,最高可达五百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一百二十至二百元;助教为八十至一百四十元;一般职员三十至

一百元；工人九至二十五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二十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十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 he 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

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莫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

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而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钱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有今不如昔之感。

学会道歉

曾读过王友琴一篇文章，是说“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事情。文章里有一处提到：一位老师说，当年动手打过他的学生很多，但多少年来，他只收到过一位学生的道歉信，对此他感到很难理解。

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反右的论文，主要分析 1957 年中国学生右派的思想资源。我查阅了一些当年大学生办的刊物，如北大的《思想战线》、《论坛》、《浪淘沙》等。我选择了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和北京大学的谭天荣作为 50 年代中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主要代表人物。谭天荣现在青岛大学物理系教书，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当年众多批判你的同学和老师中，40 年来，有多少人向你表示过歉意，以何种方式表达的？我现在还没有收到谭先生的回信，但我感觉向他直接或间接表示歉意的人不会很多。我父亲也是右派，他没赶上改正就死了。在我的记忆中，伤害过他的人从没有道过歉。向自己伤害过的人表示歉意，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问题，而是一个懂不懂礼貌的最起码的规矩。那些在学校里

起劲批判谭天荣的人,后来多数留在了大学里,而谭天荣从1958年到1969年劳动教养了11年,后又被赶回老家。那些当年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远在谭天荣之下的人,早已成了名流,他们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受了苦的同学,想到应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歉意。

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时代,而让个人在良心上寻得平衡,这不近人情,也不礼貌,有顾准、谭天荣那样的人在,我们的良心就不应该安宁,让我们学会孩子一张嘴就能说的那句话:对不起。

过去的“启事”

我在收集《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很注意从一些细小的事件中去观察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由于留意许多细节，渐渐地使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倾向于认为西方文化在过去的大学里是生了根的，在过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培养起了一种按西方文化做人做事的气度的，张东荪当年在一篇《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的论文中也认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已有了自由主义气质的，从过去的大学教授或报刊编辑身上，我们总能找到今天早已荡然无存的许多东西，我现在想从《观察》周刊的两则启事中，让大家重温五十年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

《观察》周刊在第一卷将要出满 24 期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想添一名编辑或助理编辑，所以在第 23 期的封二上发表过一则征聘启事，其中第一、第二两条是这样写的：

一、从未加入任何党派者。（任职后，如发现有

党派关系,立即停职。)

二、赞同本刊之立场及风度,对于此种出版事业具有由衷的信念,非纯因生活问题而寻觅工作者。

这是《观察》周刊的用人标准,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标准中去分析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风度,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他们当时不仅怀抱着这样的理想,而且已经将理想变成了现实,他们不仅公开出版了按自己理想所办的刊物,而且将自己的价值和理念公开告诉更多的人,这种气质和风度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看来都是一种遥远的理想,但我们在回顾历史和憧憬未来的时候,应当重新树立一个信念,或者说千万不能漠视一个起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今天多数知识分子所怀抱的理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是存在过的现实,这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我们所努力争取的实在不能说是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是重新回到那则简短的“启事”所表现出的风度中而已。

在《观察》周刊出到五卷时,编者在第五卷第三期中又发表了一则《本社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启事,这则启事更能体现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风度,我也再抄几条在下面:

本社业务日繁，需要增加工作人员，我们考虑结果，决定采用公开招考的方式。

本社创立，甫及两年，历史很短，规模极小。但是我们希望渐求发展，替国家多做一点事情。因此我们欢迎有理想、有能力，并有事业兴趣的年青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要有良好的品格，高度的办事效率，和不厌繁琐的服务精神。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仅视自己的职务为一个职业，并且把它看做一种事业，在工作中得到愉快，在工作中增加信念，并在工作中为祖国服役。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要快，要细心，要负责，不要敷衍塞责，拖混了事；在工作态度上，要和善，要诚恳，要有自发的热忱，并容易与人相处。本社两年来已养成一种传统，即人人辛勤工作，同事之间融和合作。我们的待遇虽然普通，但是在精神上大家是很痛快的。

.....

有几句话我们必须在这儿先为说明：

一、本刊是一个没有党派背景的独立刊物，征求的工作人员亦以没有任何党籍者为限，假如任用以后，发现曾有党籍者，当即无条件解职。二、本刊

是一个政论刊物，政治上的打击，无人可以预料，万一因受环境打击，致使观察周刊不能继续出版，则工作人员即须无条件的解职。这两点都希望应征诸君郑重考虑。

这则启事比第一则启事详细，在精神上可以说更强调办刊物的用意和理想。这两则启事可以看出是出自储安平之手，他在经营《观察》周刊的时候，确是把它当做一件事业来办的，而且其气质和风度完全是西方式的，由于刊物是独立的，他要求工作人员也必须具有独立性，不能有党派色彩。正是由于这种精神，《观察》才能形成自己广泛的读者群，它的工作人员所表现出的高效率 and 热情，在当时就很为人瞩目，叶圣陶在他的日记中就夸赞过当时《观察》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

两则启事是很简单的工作条例，并非刻意为之的文章，但就是从这小小的启事中，我们感到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风度，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从当时他们所树立的信念和身体力行的做事方式，他们身上已表现出一种为人信服的文化精神，假以时日，这种精神是会开花结果的。

传记不如年谱 年谱不如日记

《心香泪酒祭吴宓》出版后,引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涉及的实际是传记的真实性问题。

这一两年,传记出的很多,也很受读者欢迎,由于受欢迎,也就有所谓的传记热,问题就出在这里。传记热中实际有两类,一是自传、回忆录,二是旁人写的传记。这两种传记都有问题。

自传回忆录之类的文字,由于是本人的回忆,一般都比较可信,但这种可信有时也会受到挑战,有时由于年代久远,作者记忆有误,可能会出差错,有时由于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为避免麻烦,作者也故意隐去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还有就是人性的弱点了。那些有资格写传记的人,他们虽然总想坦率表露自己的人生经历,但能和盘托出的毕竟是少数,就是说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些东西,这些都是自传或回忆录中正常的情况,多数研究者在使用自传和回忆录提供的资料时,都要寻找旁证,如作者自己的书信、日记或旁人的回忆录,自传是可信的,但不可迷信。

传记的写作，一般说来是在自传和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及同代人的回忆基础上进行的，文学传记，有时可能略有夸张，一般研究者多不从这类传记中取材料。另一类学术传记，材料也类似，但此类传记的前提是必须注明材料的出处和来源，就是访问与传主有关的人士，也当有详细的记录或录音之类，不能出示孤证。现在许多传记作者，有时为了加大传记的篇幅，常有用小说家笔法的，甚至有伪造材料的，本来没有采访当事人，却硬要以采访者叙述史实，本来使用的是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却硬要以原始档案的发掘者来迷惑读者，这些都是涉及传记作者学术道德问题的。这一两年的传记都做得很长，自然也就很水，有些传主，本来没那么多资料，也没有多少事，但也被一些没有传记写作常识的人硬凑成一本厚厚的传记，这类传记，其实没有多大价值。

传记对普及学术是一极好的形式，但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一形式，尤其不能先存了欺骗读者的心理，胡编乱造，毫不负责。今天的读者都有一个感觉，前辈学人写传记都很短，如胡适《丁文江的传记》那类，而今天的人已忘记这个好传统了。

现在说张紫葛先生的这本传记。这本书说是自传或回忆录，都不能成立，我是把它作为一本传记来读的。这本传记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直接与传主有过交往

的人写的,虽是传记,但又多少有一点回忆的色彩。这种类型的传记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能提供一些第一手材料,但短处是作者的回忆可能有不可旁证的随意性。对这类传记的一个起码要求是作者与传主之间的熟悉程度是学术界公认的,而不能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熟人。比如鲁迅之于冯雪峰,俞平伯之于周作人,这样的关系才是传记或回忆可信可证的起码条件。现在看来,张紫葛先生的这本回忆吴宓先生的书,似乎这方面不很过硬,所以才出现许多说不过去的地方。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这本传记写得太长了,有太多的小说家笔法。书前钟鸣先生的代序,去年曾在《街道》杂志刊出过,当时我就发现这篇序言中关于钱钟书的材料基本都是道听途说,尤其是钱钟书去西南联大和后来离开的情况,钟鸣都说错了,还有傅斯年做过清华大学校长之类的硬伤,这些情况当时我曾给《街道》写过一篇文章,未刊用,后我投给北京的《博览群书》登出来了。现在收在书中的这篇代序,虽然删除发表时的几处硬伤,但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情况并不了解,所依据的资料都是未经证实的掌故轶闻之类。好在吴宓先生的日记也将出版,张紫葛先生的书,大家对比一下就明白了。对传记的基本看法,我是相信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的。

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 邓琮琮著)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这是一本不错的书,大体上说是值得推荐给多数人看一看的。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好的,在作者看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生物学家胡步曾（由于胡先生的常用名中有一个不常用的字，为了不给排字的人添麻烦，就用胡先生的字吧），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院士，1955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后，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日记第2册第1257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事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
选举“人事组”的“人文”
部分的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 } 想不出人名
民族学 }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 15 册)

这是 1947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增湘，1948 年就没有选成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可桢上面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124 页）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个共产党人。委员长看到郭沫若的名字说：‘啊，好得很，我对此

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 1933 年在东京时我曾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感。

右派的比例是怎么确定的

由于我父亲是右派，这多少年来我对有关右派的资料一直很留意，有关反右的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够收罗齐全。关于这场运动，国内外已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反右派的比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1957年共有55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但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它的具体数字是很难确切知道的。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后来不久，又说有40余万人。1959年中央在一份关于摘掉悔改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中，说约有45万人。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1980年共改正了54万余人，余下的5000余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这么大的政治运动，要详细精确统计出受难者的人数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法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55万这个数字是确定下来了，一般研究者都采用这个说法。李维汉晚年的回忆录

《回忆与研究》中也认为：“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 55 万余人。”（该书下册 839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李维汉反右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 55 万的数字是根据什么订出来的？谁订出来的？

我每读有关反右的资料，就绕不过这个问题，后来读了毛泽东的一些书，才感到这个 55 万右派的比例与毛泽东的数字观有联系。

毛泽东是受传统文化教育长人的，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读的是经史子集，《水浒》、《三国》之类，在数学一科中，毛泽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文革”时期，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一封信中也说过，自己数学不好。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尤其在 50 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的数字观有很具体的表现，我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抄出几例，以说明他老人家对数字的喜欢。“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 80 多只，今天汇报就有 150 只，可能达到 200 只。”（该书 3 册 89 页）看毛

泽东的批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 8000 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酌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布不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225 页)在三反时期，毛泽东的几乎所有重要批示都有关于数字比例的现象，而且此时就已形成了政治运动关于人的“预算观”，就是说运动中应有多少人成为运动本身的对象，都是经过预算的。

我先注意到毛泽东的数字观和预算观，我就想找出他在使用数字的时候，一般的习惯是什么。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 1952 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151 页)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

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页）1955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同上23页）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万左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解放军里一部分，商业银行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有新闻记者、医生……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毛泽东思想万岁》138页）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57年3月，在他的记忆中，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所以他以后的批示，讲话中，都以这500万知识分子为基数。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界代表谈话，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了堆。”（同上153页）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

右。这 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 500 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379—380 页)按毛泽东的习惯,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 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 55 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喜欢百分之十这个比例,说 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可靠,但是说到这 500 万人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的人,毛泽东又用了他的比例观:“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就 500 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同上 380 页)反右开始以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过一份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他说:“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同上 537 页)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

使 500 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 500 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而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 55 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回忆与研究》下册 339 页)

说稿酬

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一书中，有一段写到他当年和朋友们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其中有这样的看法：“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费先生当年就“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的那一场争论，最能给人启发的是：“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

我在这篇说稿酬的文章中，基本也采用的是费先生他们的思路，这个思路的特点就是：这都是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

稿酬制度的变革，初看是个技术管理性的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分配方式的问题，但往深里想，远不这样简单，它的消失、恢复和始终徘徊不进，也正是由于稿酬制度的变革，到了今天这样的处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分配方式了。

经常有人谈论今日的稿酬制度怎样不合理、怎样偏

低,应该尽快提高之类的问题,而很少有人从别处想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这里出了问题,而又难以解决呢?可见问题的症结并不在稿酬制度本身。

1949年后,最早消失的是版税制,由取消版税制到一次性付酬,再到稿费制度的完全消失,这个过程不是单纯的管理方式的变革,而是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版税制的形成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出版本身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就其作为生存的基本前提而言),由于是商业行为,所以建立和消失都由市场决定。二是那些享受版税制的文人是自由写作的。版税制存在的这两个基本前提的核心内容是出版自由和写作自由,这个核心没有了,版税制也就自然消失了。

文人本应是自由职业,但这种自由职业很快为单位职业所取代。从管理的角度讲,你是自由职业的时候,政府自然会有相应的空间使自由职业能够有其依赖的生存机制,这就是版税制,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现在自由职业忽然转换成了单位职业,过去的自由消失了,从管理的角度看,基本的空间缩小以后,必然要以另外一种方式使文人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并很好地为我版务,这时自然也就出现了工资、公费医疗、单位分配住房等一系列养起来的措施。从生存的意义上看,这一切在一定的时期内减轻了文人生存的压力,文人也许在短时间内还未

必能意识到，这种减低生存压力的境况是以自由为代价的。从目前已知的史料看，当时取消版税制是考虑到缩短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距离的，由于取消版税制的前提是建立在一切都包起来和养下去的机制上，公平地说，在 50 年代初，这种制度的消失并没有给文人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也就没有引起多大的副作用，可以说大家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可以这样说，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取消版税甚至取消稿酬都是能做到的，从公平的意义上说，也不无合理性，因为取消是建立在什么都给你（物质上）的基础之上的，但事情发展到今天，情况就远不简单了。

我们现在已经向市场经济迈进，对文人来说，尴尬的时代就到来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尴尬不是由于文人无能，而是因为体制尚未能使文人真正进入市场。现在多数文人都抱怨稿酬偏低，这个感觉首先来自于文人工资收入的下降，现在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靠工资维持一个中等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自然就要想到稿酬，但人们常常简单地把文人仅仅看成是拿稿酬生活的人，这至少是不全面的，文人的真正意义不单在他们是一个拿稿酬生活的阶层，而是他们自身就是新闻和出版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是依赖这种体制的自由生长而生存的，现在作为单位之内的文人，他们虽然享受了一些较低的生存保障，

但同时又在受着强大的市场挤压，而这种挤压靠呼吁提高稿费是缓解不了的，要想从根本上缓解这种挤压，文人现在的任务不是呼吁提高稿酬，而是呼吁要让自己能有更适宜生存的机制。没有某种适宜于文人生存的机制，提高一点稿酬也无济于事，况且提高稿酬，对政府来讲，也是一件头痛的事，因为现在多数报纸、刊物是养着的，现状是半死不活，下不了决心让他们死，但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再养活他们，提高稿酬不是说说而已，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这谈何容易，文化和文人在只有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还是很可怜的角色，所以他们才总在追求另一种东西。

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

20 世纪快要过去了。回想这一百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遗憾。遥想当年，当古老的中国和西方发生碰撞的时候，有多少道路出现在我们前辈的眼前，可从头到尾，这一百年间，我们最终走上的道路，并没有成为前辈，至少是五四时代那些知识分子所期待的路，德先生和赛先生，今天还让更多的读书人怀念和企盼，这是中国人的幸运抑或不幸？

我一直想从世纪的开始，找一个人，看他的经历如何走完，看他的理想如何破灭，看他的精神怎样流传。我翻过了许多资料，也访问过许多老人，最后我找到了这个人。他的经历能否成为这—一个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我不知道，但至少从他的命运中，我能看见一个人是以怎样的努力来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这个人就是储安平。

储安平是 1909 年生人，在他诞生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 20 世纪，在他 3 岁的时候，辛亥革命发生，当他 10 岁的时候，我们有了五四运动。这位出生在江苏宜兴的少

年，在他读书的时候，开始关心政治，开始对自由主义的理想产生向往。他的青年时代，是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努力奋斗的时期，他们开始播散自由思想的种子，从最早的《努力周报》到《现代评论》，从《独立评论》到《新月》杂志，储安平沐浴着自由主义的阳光成长起来。《新月》晚期，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他已开始跻身于《新月》文人集团，他在晚期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散文，但这时的储安平已将理想确定在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上，1929年，他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当时的光华大学有张东荪、罗隆基、潘光旦、王造时等前辈知识分子，当他离开光华的时候，在他心中已扎下了自由主义的根，1936年，他以记者身份前往德国采访奥运会，后转赴英国，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学习。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中国，先后写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传播的是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青年储安平，已开始立志接过胡适、傅斯年等人手中的接力棒，然而遗憾的是这根接力棒传到储安平手中时，时代已不允许他再往下传了。

1945年是储安平事业开始的时刻，这位36岁的青年，在抗战胜利后，到重庆创办了一个刊物《客观》，这时的储安平，已雄心勃勃地认为从此中国将迎来一个民主宪政的时代，他批评国民党，抨击贪官污吏，以自由主义

的理想为做人行事的最高原则。当时的储安平，如果仅从个人的生活状况考虑，可以说应有尽有，他曾做过大学教授，做过《中央日报》的主笔，如果不是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他不会舍弃许多优厚的生活条件，而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办刊之路。

1946 年春天，储安平离开重庆，靠了朋友的帮忙，他到上海创办《观察》周刊，他找了许多朋友当这本刊物的撰稿人，这批人多数是自由思想分子。在《观察》初创时期，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期望得到他的支持，这时的储安平是将胡适看成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是储安平的理想，也是他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储安平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他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从他这一代人开始，将中国带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不管他当时的想法是否现实，或者今天看来多么幼稚，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嘲笑青年储安平所抱定的理想，如果没有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播下的自由思想的种子，我们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储安平办《观察》的时候，南京方面曾请过他几次，他都未加考虑，当时他的同学李惟果、沈昌焕均已从政，而且仕途看好，但储安平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

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储安平所选定的最好的路，就是办刊物，而且他办成了。差不多 50 年后，1988 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对《观察》作了这样的评价：“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做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的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余英时本人也在他的自传中说过，他当年在北平就是读着《观察》、《新路》这些刊物成长起来的。储安平在给胡适写信的时候，还给傅斯年写了信，在信中表达了他想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理想，他说：“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政治局面下是苦闷并痛苦的，先生所言极其同感。我想我们最要紧的是立住脚跟，心无所求，假如不想做官，即无需迎合国民党，假如不想投机，即无须迎合共产党，心无所求，才能言所欲言，不偏不倚，不计功利，尽心为之。”《观察》在艰难中存在了近三年，1948 年 12 月，被国民党封门。储安平先逃到北京，最后留了下来。1949 年后，《观察》曾复刊过一

段时间,但此《观察》已非彼《观察》,很快就为《新观察》取代了,储安平也终于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周刊,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1957年储安平放言“党天下”,又拿出当年办《观察》的劲头去办《光明日报》,然而时代已经变了,他的那一套已不再为时代认可。他作为右派,从此消失了,1966年自杀。储的悲剧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最具悲剧感的,因为他由办刊始又由办刊终。我在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不止一次地想到了同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殷海光。殷海光差不多比储安平小10岁,这位出身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到了台湾。他曾说过,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是在西南联大打下的,作为金岳霖的学生,他受到过金岳霖的很大影响。在储安平成为右派的时候,殷海光也正作为《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在为他一生的理想而奋斗。殷海光后来受到迫害,在抑郁中患癌症去世。殷海光早年曾受胡适的影响,后来虽有分歧,但就整个思想发展的脉络看,都是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储安平曾经播散自由思想的种子,但他没有看到收获,事实上也没有收获。殷海光为自由主义奋斗了十几年,最终换来了一个宪政的时代。我曾经天真地希望在储安平之前再有一个胡适,同时再有一个雷震,也许这样的格局是自由主义理想最容易成功的一种局面,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享有极高的社

会声望,而雷震本人是政界觉醒了自由主义官员,加上殷海光这样不计较功利的在野知识分子,这样共同奋斗的结果,总会曲折之后有新天地的。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只有一个储安平在孤军奋战,他的理想要在他死后的30年,才重新为人怀念。

储安平办《观察》的时候,靠的是大学教授,而这批大学教授,又大多来自于战时设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在做完储安平和《观察》研究之后,即开始收集西南联大的材料。我的想法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理想,所以不灭,所以在经历了严冬的摧残后尚有生机,靠的是这样一条线索来传播,即我设想中的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过去是这样,今后恐怕也是如此。战时的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就是因为在她们那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得到普遍推崇,用王浩的话说就是:“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储安平。《观察》周刊。西南联大。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从胡适、殷海光、雷震的道路,我们又看到了这种努力将换来的东西。真正的理想,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